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碩士學位論文

擘劃的民主：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與任務駐在

國民主化關係初探，1958-2020

Nourishing Democracy: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of Host State from 1958 to 2020

指導教授：張文揚 博士

研究生：王為世 撰

中華民國 110 年 07 月

## 摘要

自 Neack(1995)探究工業化西方國家參與維持和平行動的動機以降，學者們對於維和任務能否促進一國民主轉型有相當豐富的討論。各方學說百家爭鳴，並在 2000 年後聚焦於維和任務派遣團內生性因素對駐在國民主進程的影響：如性別比例、國籍組成、任務授權目標差異性等進行討論。本文作者認為維和任務能促進國家民主政治的自由發展，在使用 1958 年至 2020 年間 42 項維和任務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後，發現民主化成效取決於駐在國內部脆弱程度。本文亦針對海地及克羅埃西亞兩國進行個案分析，發展出國際與國內兩種層次的分析架構。探究駐在國中央政府與叛軍關係如何影響任務成效，同時瞭解區域國際組織與第三方行為者在維和任務執行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期望對國際社會民主進程相關理論有所貢獻。

關鍵詞：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任務駐在國民主化、任務駐在國脆弱程度、任務駐在國中央政府與叛軍關係、區域國際組織與第三方行為者

## Abstract

Since Neack(1995) explored the motivation of western countries engaging in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PKO), academics have initiated abundant discussions regarding whether PKO could facilitate the democratization of host state. Arguments were raised, mostly focused on endogenous variables including gender distribution of personnels in troops, nationality composition of peacekeepers, and the mandates of each operation. This thesis contends peacekeeping deployments can foster host state's civil liberty, or even nourish its democracy developments. This research adopts data of PKOs from 1958 to 2020 to verify the causal relations between peacekeeping deployments and democratization of host state, and it appears that the vulnerability of host state is a focal effect in empirical research. Simultaneously, this thesis takes PKOs in Haitai and Croatia to conduct a case study applied with a two-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The outcome illustrates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democratization of the host state depends on “domestic variable- relations between central authority and rebellions” and “global variable- regional hegemony and third-party actors.”

Keywords: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 democratization of host state 、 vulnerability of host state 、 relations between central authority and rebellions 、 regional hegemony and third-party actors

#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	8
第一節 維持和平行動的當代角色 .....	8
第二節 維和任務駐在國的民主進程 .....	11
第三節 影響維和行動任務成效的要件 .....	13
第四節 研究設計 .....	16
一、使用資料庫、概念化及操作化定義 .....	19
二、研究限制 .....	20
第二章 文獻回顧 .....	25
第一節 維和行動促進任務駐在國民主化 .....	25
第二節 維和行動延宕任務駐在國民主進程 .....	28
第三節 本文發展之研究理論 .....	31
第三章 量化分析 .....	34
第一節 計量經濟模型 .....	34
第二節 變數 .....	34
一、自變數 .....	34
二、依變數 .....	36
三、控制變數 .....	36
四、統計軟體 .....	37
第三節 統計結果 .....	38
第四節 穩健性檢驗 .....	40
第四章 個案分析 .....	43
第一節 成功案例 .....	43
第二節 失敗案例 .....	53
第五章 結論 .....	57
第一節 研究發現 .....	57
第二節 研究建議 .....	60
中文參考文獻 .....	63
英文參考文獻 .....	63
附錄一 執行中的維持和平行動 .....	72
附錄二 執行完畢的維持和平行動 .....	73
附錄三 投票支持維和任務(本文研究個案)的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 .....	76

## 表次

表 1.1 本文研究樣本 .....	17
表 1.2 維和任務授權以兩時間段三性質呈現 .....	24
表 2.1 影響維和任務成效的因素 .....	32
表 2.2 以國際與國內層次作任務成效衡量指標 .....	33
表 3.1 描述統計表 .....	38
表 3.2 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和任務駐在國民主化關聯之統計結果 .....	39
表 3.3 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和任務駐在國民主化關聯之統計結果 .....	41
表 4.1 於海地執行之維持和平行動 .....	44
表 4.2 UNMIH、UNSMIH 與 UNTMIH 變數統計表 .....	44
表 4.3 以國際與國內層次作任務成效衡量指標 .....	48
表 4.4 於克羅埃西亞執行之維持和平行動 .....	49
表 4.5 UNCRO 與 UNMOP 變數統計表 .....	49
表 4.6 以國際與國內層次作任務成效衡量指標 .....	53
表 4.7 於海地執行之維持和平行動 .....	54
表 4.8 MIPONU 變數統計表 .....	54
表 5.1 量化分析對照表 .....	59

## 圖次

圖 1.1 至 2021 年執行中維持和平行動地點散佈圖 .....	9
圖 1.2 維和任務數量趨勢圖 .....	10
圖 2.1 維和任務有助於駐在國民主化的因素 .....	28
圖 2.2 維和任務無益於駐在國民主化的因素 .....	31



## 縮寫表

英文縮寫	英文全名	中文名稱
UNDPO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Peace Operations	聯合國和平方行動部
UNHCR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
OAS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美洲國家組織
IACHR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美洲國家組織人權委員會
G8	Group-8	八國集團
AU	African Union	非洲聯盟
ECOWAS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
NATO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USAID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美國國際開發署
EUCSDP	European Union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	歐洲聯盟共同安全與國防政策



# 第一章 緒論

聯合國海地司法支助特派團(United Nations Mission for Justice Support in Haiti, 以下簡稱 MINUJUSTH), 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於 2017 年根據第 2350 號決議授權, 在海地執行的維持和平行動。2019 年 6 月 25 日, 安全理事會通過新決議終止駐海地維和任務, 派遣團 MINUJUSTH 並於同年 10 月 15 日撤離。這項舉措觸發本文作者進一步認識維和任務的動機。一項維和任務被宣告終止, 取決於任務是否成功締造駐在國和平穩定。本文欲瞭解維和任務與推進任務駐在國當地的民主化是否相關, 作者將檢視自 1958 年至 2020 年已經執行完畢的維和任務, 並依照體系和平中心(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政體特徵與轉型資料庫(Polity V: Regime Authority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 Datasets, 以下簡稱 Polity V)中對駐在國在任務開始前及任務結束該年的民主評分, 經由實證方法尋找維和任務與民主進程的相關性, 藉而更全面地瞭解維和任務之於國際社會民主化的助益。

## 第一節 維持和平行動的當代角色

國際衝突發生時, 維持和平行動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大會決議組成, 再由秘書處秘書長統籌、監督各國自願組成的派遣團。<sup>1</sup>在為數不少大小零星的武裝衝突中,<sup>2</sup>截至 2021 年共有十二個地區/國家駐有聯合國和平行動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Peace Operations, 以下簡稱 UNDPO)<sup>3</sup>負責執行的維和任務派遣團。<sup>4</sup>如圖 1.1 所示, 非洲共有六項正在執行的維和任務, 巴爾幹半島與印度、巴基斯坦邊界各有一項任務, 而阿拉伯半島上共計有四項任務。維和任務的角色及功能依據駐在國內政狀況而有所不同, 宗旨多為控制、緩衝國家間衝突, 也囊括協助調停一國內戰或是促成族群衝突停火談判。Zanotti(2006)把維和任務定義為:「維

1 根據 United Nations Charter(1945)秘書長負責監督維持和平任務的執行。至今九任秘書長中, 第三任秘書長吳丹(U Thant)來自緬甸、第六任秘書長蓋里(Ghali)來自埃及, 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21)的世界自由度評分, 緬甸與埃及皆屬不自由的非民主國家。由於維和任務的執行轄屬於聯合國秘書長, 因此在探討維持和平任務成效與駐在國民主化相關性時, 秘書長與秘書處的影響不應忽略, 或許在未來的相關研究上可以多加著墨。

2 請參考 Strand, Siri, Henrik and Håvard(2019)。

3 2018 年 8 月 23 日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Peacekeeping Operations)更名為聯合國和平行動部(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Peace Operations)。https://www.un.int/news/un-reform-two-new-departments-peace-and-security-pillar(Accessed on June 2, 2021)。

4 維和任務派遣團的組成, 是會員國根據各項行動的需求, 自願派出軍事、警務和行政人員(UNDPO, 2020)。



和任務透過建立紀律和監管機制來遏制混亂，改革潛在失敗國家的政治體制，屬於一種透過獎勵及懲罰機制來指導國家的行為」(Zanotti 2006, 150)。



圖 1.1 至 2021 年執行中維持和平行動地點散佈圖

資料來源：UNDPO(2021)。

然而，唯有先穩定駐在國國內政治情勢，方可能改革其政治體制。故「維和人員得在任務授權下掣肘用武叛軍，並約束試圖破壞和平協定的行為者」(Tardy 2015, 12)。行動的首要目標是避免衝突事件再次發生，如 Pushkina (2004)所述：

1. 維和任務應有能力阻止大規模暴力與街頭衝突，具體手段為設立停火區、安置難民、提供即時醫療援助，並給予基本生活物資、減少死傷人數。
2. 派遣團應協助交戰雙方執行和平協定內容，或促成停火協議。
3. 派遣團應協助駐在國政府重建電力、自來水、大眾運輸等公共建設，恢復民眾正常起居。

維和行動遏制衝突再生後的下一階段，是人權維護。包括促進公民自由、終止言論審查等人權迫害情事。也就是說，「派遣團的最終目標是在部署期間終止戰爭，甚至包含於駐在國建立民主」(Heldt & Wallensteen 2005, 34)。當維和行動無力阻止交戰雙方對平民、種族的人權侵害，該任務無疑是失敗的。

目前正在執行的十二項任務中，功能包括協助駐在國舉辦合法選舉、建立司法機制，盼最終達到重建地區秩序、恢復政府治理能力的目的。冷戰後國際社會執行維和任務的主要形式有兩種，分別為：建立制度化的國家紀律(institutional disciplinary)和政府化(governmentalization)。前者乃「透過改革失敗國家的國內政治制度，將前任政府的執政型態轉變為有序、可預測的模式，使中央機關決策能更清晰明確地傳達給地方政府去執行。而國際社會在外交、經貿領域上也能更明瞭該國政府的運作模式，並建立雙邊關係」(Zanotti 2006, 152)。而後者是「透過傳遞、擴散國際知識和控制機制(mechanisms of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and control)政府化此國。促使該國內國法化國際條約、國際習慣、一般法律原則等國際法主要法源，再經由這些國際法規範監督、評估該國的執政表現與治理情況」(Zanotti 2006, 152)。由此可知，除了維持當地穩定，能否於駐在國建立一套符合國際社會慣習的執政機制，也是評估維和任務是否成功的要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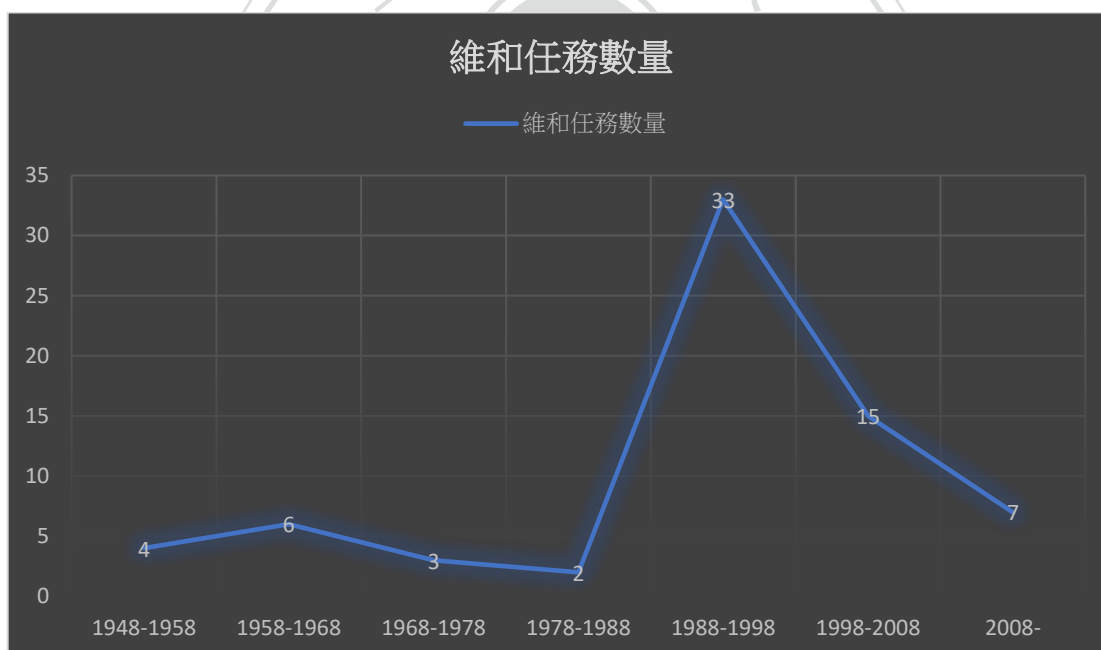


圖 1.2 維和任務數量趨勢圖

資料來源：UNDPO(2021)。

統計至 2021 年共有 70 團來自安理會及大會決議的維持和平行動，其中 1988 年至 1998 年間執行中任務達到最高數額，如圖 1.2 所示該十年間共計有 33 團派遣團。隨著駐在國政府恢復治理能力，維和任務告終派遣團逐一撤出，扣除 12 團仍在進行的任務，共有 58 團任務執行完畢。最後一團是 2020 年 12 月結束的達佛混合行動(African Union - United Nations Hybrid Operation in Darfur)。

## 第二節 維和任務駐在國的民主進程

Huntington(1991)認為保證民主的存續，如建立以民主實踐為基礎的政治體制，及確保公眾參與政治的權利等，能避免新生民主國家倒退回專制獨裁。而本文作者相信各國良好的內政表現，有助穩定世界各區域和平，最終利於建立全球自由民主制度。學者如 Andersson(2000)、Håvard, Tanja, Scott and Nils(2001)、Fjelde & Höglund(2011)、Mosquera(2011)、Adhikari(2020)、Albrecht (2020)、Ari & Theodora-Ismene(2020)的實證研究結果，也支持維和任務將能降低衝突復發可能性，並推動駐在國民主化。

若假定維和任務除了能穩定當地和平，派遣團會進一步促進駐在國民主化，如此一來該如何驗證其民主進程？常見的驗證手法，乃採用國際智庫對世界各國民主表現的評分。前文述及 Zanotti(2006)認為維和行動藉由建立制度化的國家紀律(institutional disciplinary)，並政府化(governmentalization)任務駐在國，進而擘劃該國民主政治的發展。諸多智庫對民主政治發展的評估指標，也圍繞著相似的概念。如 Polity V 1946 年至 2018 年度時間序列資料(Polity V Annual Time-Series, 1946-2018)中，<sup>5</sup>評估民主政治發展的概念與指標(concepts and component variables)分別為：

第一，行政首長的推選方式(polity executive recruitment)，再依照情況細分成八種類型。

1. 政權繼承的方式採血統主義(ascriptio)。
2. 血統繼承與指定繼承並存(dual executive: ascription and designation)。
3. 政權繼承的方式採指定繼承，屬於政治菁英間非正式的競爭方式(designation)。
4. 政權繼承的方式屬團體內部選舉(self-selection)。
5. 逐步公開選舉過程的內部推選(gradual transition from self-selection)。
6. 血統繼承與內部選舉並存(dual executive: ascription and election)。
7. 有限制的公開選舉(transitional or restricted election)。
8. 社會中民眾支持的各項候選人公開競爭(competitive election)。

---

5 Marshall & Gurr(2020)將 Polity V 中得分為-10 分至-6 分者定義為獨裁政體(autocracies)，得分為-5 分至+5 分者定義為半民主政體(anocracies)，得分為+6 分至+10 分者定義為民主政體(democracies)，另有三種特別數值(three special values)為-66 分、-77 分、-88 分。

第二，政治參與及執政權的競爭(polity political competition)。是一項複合指標，由是否保障規律參與政治(regulation of participation)與執政權競爭力(competitiveness of participation)組成，並依照情況細分成十種類型。

1. 政治壓迫(suppressed)：不允許反對勢力存在，公民無參政機會。
2. 有限參與(restricted)：允許部分利益團體參與政治，但限制群眾討論有關政治進程的重要議題。
3. 操控下的轉型過程(imposed transition: loosening or tightening restrictions)，其中包含限制(restricted)、抑制(suppressed)、派系競爭(factional)等不同階段。
4. 尚未達成制度化(uninstitutionalized)：政黨、利益團體不規律地參與政治，國家機器往往服務特定地區利益、宗教或種族團體。
5. 制度化的建立過程(gradual transition from uninstitutionalized)。
6. 派系政治與有限參與並存(factional/restricted)。
7. 同一政黨內派系間對政治影響力的爭奪(factional)。
8. 持續發生衝突下的轉型階段(electoral transition: persistent conflict/coercion)：組成中央政府的政黨，透過執政權分配利益，並施壓具競爭力的團體。
9. 衝突大幅降低的轉型階段(electoral transition: limited conflict/coercion)：有相對穩定的政黨政治，競爭中央執政權。但彼此間訴求相異，少有共同利益。
10. 制度化選舉(institutionalized electoral)。

由上述概念得知，Polity V 用以評估一國民主變化的指標，包含行政首長的推選方式、保障政治參與及執政權的競爭等，恰好如同 Zanotti(2006)對於「維和行動乃經由獎懲機制建立一國政府紀律(institutional disciplinary)之過程」的見解。因此若維和行動順利執行，應預期該國政府制度有序、常態發展，使民主政治愈臻成熟。故本文以 Polity V 對任務駐在國的民主評分，檢視維和行動介入下駐在國的民主變化。



### 第三節 影響維和行動任務成效的要件

建立符合國際社會慣習的執政機制談何容易，派遣團促進駐在國民主政治的過程中，有諸多影響成效的因素應被考量。首先，「地主國政府與人民對維和行動的同意(consent)；促進中央政府和叛軍間和平進程時謹守公正立場；非出於自衛和履行職責不得使用武力」(UNDPO, 2021)等原則是執行維和任務的基本規範。其他有助於任務執行的重要因素包括「完整記錄人員配置、後勤補給和資金流動；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對行動的一致支持；鄰國和區域第三方的積極參與；派遣團成員謹記職業操守、尊重當地人民」(UNDPO, 2021)。<sup>6</sup>

Mironova & Whitt(2017)認為「維和部隊能在敵對勢力間建立和平規範(norms of positive peace)。且具有強制執行權限(enforcement authority)的派遣團，相較於僅授權監督的維和任務，更能促進積極和平」(Mironova & Whitt 2017, 2079)。意即當一派遣團內負責執行停火授權的軍事人員比例越高，終止衝突的成效會越好，衝突減緩的趨勢越顯著。而 Mattes & Savun(2010)則指出，維和任務透過呼籲國際社會監督駐在國恢復治理機制、要求交戰雙方向派遣團提交軍事情報、核對叛軍作戰能力等手段，能有效解決訊息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ies)的問題，並促成雙方簽署和平協議，遏止內戰或衝突再起。因此，當任務授權從阻止衝突晉升為建構和平，一個負責消弭訊息不對稱、由文官與警察組成的派遣團，將能提高建構和平的任務成效。本文認為由於維和任務的短程目標為終止內戰並鼓勵衝突雙方簽署和平協定，因此當派遣團成員軍職比例高於文職比例時，達成「簽署和平協定」此項目的的成效將較高。接著，維和任務的長程目標為重建社會，因此當派遣團成員文職比例高於軍職比例時，達成「穩定政權並建構和平」此項目標的成果將更顯著，故有利深根民主政治。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與叛軍的關係將影響維和任務的執行成效。Lindley(2007)提出在衝突地區巡邏、與交戰方領導人保持聯繫，是派遣團作為國際監督者的主要任務。透過確保爭端雙方落實協議，派遣團可以掌握駐在國內叛軍的作戰能力，並透過降低威脅意圖減輕不確定性，從而避免戰爭再次發生。故駐在國內叛軍的配合，顯然是派遣團能否執行停火協議的關鍵。本文認為當國家分裂四方割據的

---

6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Peace Operations. 2021. "What is peacekeeping: Our successes." <https://peacekeeping.un.org/zh/our-successes> (Accessed on April 13, 2021)。

情況越嚴重，欲統一談判資訊、解決訊息不對稱會更為棘手。因此，當叛軍四散使國家政權碎裂，將延緩維和行動建立政府紀律、促進民主政治的目標。

中央政府是否在恢復和平後發展穩固的治理能力，亦會影響建構和平的任務成效。當國家無力提供基礎公共建設、保障基本人權，或甚至不具執政權威的合法性，可見該國政府效能脆弱不堪。如 Zanotti(2006)所述政府化(governmentalization)目的是提升地主國執政表現，倘若治理現況並無隨著維和行動的介入而改善，更遑論要發展民主政治。因此在探究維和行動成效時，穩健的政府治理能力是關鍵因素。

維和任務的成效除了受制於派遣團內軍職與文職比例差異、叛軍導致的政權碎裂程度與國家治理能力的脆弱與否，在任務執行過程中還會受部隊派遣國(troop and police contributors)與區域型國際組織等第三方行為者(third party intervention)影響。舉例來說，1996年至1999年科索沃戰爭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分別發佈第1160號(1998年)、第1199號(1998年)、第1203號(1998年)和第1244號(1999年)決議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以下簡稱 NATO)便曾介入南斯拉夫，協助聯合國維持當地和平。另一個例子是2003年至2011年第二次波斯灣戰爭，聯合國發佈第1441號決議後也能看見由美國為首的 NATO 進入伊拉克維持和平。<sup>7</sup>

關於第三方行為者介入的原因，Rost & Greig(2011)認為任務駐在國為派遣國前殖民地、任務駐在國與派遣國乃軍事盟友、任務駐在國與派遣國為貿易夥伴、任務駐在國與派遣國屬於相同族裔等關聯皆是影響國家參與維和任務的因素。另一方面，Rost & Greig(2011)也發現在比較大國與小國參與維和行動的動機時，兩者存在差異。小國傾向干預一場長期存在、起源於種族衝突的內戰。而大國則是以戰爭造成的死亡人數、衝突是否涉及眾多交戰方等，作為考量參與行動的依據。

8

---

7 Anthony(1997)以印度和巴基斯坦於克什米爾地區衝突為例，檢視美國作為第三方介入區域衝突後造成的影響。「當印度和巴基斯坦違反停火協議，聯合國印度和巴基斯坦觀察組織(United Nations Military Observer Group in India and Pakistan)完全無法發揮作用。但經由美國的介入，巴基斯坦更有意願配合聯合國的安排，達成國際社會對維持克什米爾地區和平的要求」(Anthony 1997, 19)。與此同時，美、印、巴關係中戰略和經濟利益正在趨同，美國扮演鼓勵印巴雙方進行建設性對話的重要角色。

8 然而也有學者提出反證，認為與內戰中國家有利益糾葛的第三方行為者，會選擇不介入當地衝突。Chen & Kyle(2020)使用烏普薩拉衝突數據計劃(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的管理跨國衝突資料庫(Managing Intrastate Conflict)數據，發現與衝突發生地鄰近的國家、政府間組織或非政

相較於國家多以自利思維介入維和任務，Pevehouse(2005)認為區域型國際組織參與維和行動的手段更為複雜，目的亦包含民主轉型駐在國。如透過提供金援，鼓勵成員國國內政治自由化，達到鞏固民主的作用。針對轉型中國家，區域組織會要求新生民主國家遵守區域政策，並協助新政權獲得國際認可。針對非民主國家，區域組織會向獨裁政權施壓，要求放鬆政府對公民社會和政治團體的控制。再者，區域型國際組織透過提倡貿易自由、疏通金融危機等改善經濟狀況的手段協助威權政府轉型，加速民主進程。以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以下簡稱 EU)為例，EU 與 UN 於 2003 年發布《歐盟與聯合國針對危機管理的合作聯合宣言》(Joint Declaration on EU-UN Cooperation in Crisis Management)。日後 EU 依據《歐洲聯盟共同安全與國防政策》(EU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se Policy)，派駐武裝部隊協助 UN 執行維和行動。Carnegie & Nikolay(2017) 指出 EU 經常透過支援維和行動改善駐在國的人權狀況並促進其民主體制。「EU 中有許多會員國是維和行動任務駐在國的殖民母國，而當 EU 理事會主席輪值由殖民母國國籍者擔任時，主席會在編列預算時增加殖民地子國的外國援助。而殖民地子國也會為了取得更多資源，積極推動國內的政治改革」(Carnegie & Nikolay 2017, 10-11)。

Heldt & Wallensteen(2005)也以區域大國與國際組織間的角力，詮釋第三方行為者如何影響維和任務與駐在國民主化間的關係。「國際社會在區域建構維和行動能力時，需要區域政府間組織的輔助。如八國集團(Group-8)與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以下簡稱 AU)非洲待命部隊(African Standby Force，以下簡稱 ASF)向各項非洲維持和平行動提供的技術合作與財政援助」(Heldt & Wallensteen 2005, 41)。

<sup>9</sup>Duursma(2017)則發現有些維和任務因為缺乏非洲第三方的協作，因此派遣團在

---

府組織「沒有顯著證據證明，會持續提供調解、從中斡旋或參與後續的和平協議進程。事實上若既得利益(vested interests)受損，第三方會果斷退出維和行動」(Chen & Kyle 2020, 21)。

9 根據非洲聯盟和平及安全理事會(African Union Peace and Security Council)(2019)，《非洲聯盟組織法》(The Constitutive Act)賦予 AU 在會員國涉及戰爭罪、種族滅絕罪和危害人類罪時，可以《關於建立非洲聯盟和平及安全理事會議定書》(Peace and Security Council the Protocol Relat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ace and Security Council of the African Union)第 13 條，組成包含軍事、警察和文職人員的 ASF，避免該會員國內的傷亡擴大。

ASF 的職權包括：

1. 觀察和監測任務。
2. 其他類型的和平援助行動。
3. 根據《非洲聯盟組織法》第 4 條，在危急時刻或回應成員國請求下，對另一成員國進行干預，以恢復和平與安全。
4. 預防性部署，以防止爭端或衝突升級。避免持續的暴力衝突蔓延到鄰國，或避免衝突各方在達成協議後暴力衝突再起。



介入區域衝突時面臨諸多阻礙。由於任務授權不符合非洲式的解決規範與行為準則(African solutions norm)，因此維和行動往往難達到穩定駐在國的目標。反觀區域型國際組織能向叛軍提供符合當地需求的輔導資源，同時改善區域內各方行為者與聯合國間的協調與合作。1960年至2012年間非洲經歷938起衝突年(conflict dyad-years)，在938場衝突中有334起事件透過調解解決。而當中擔任第三方調解人依參與次數計算分別是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肯亞(Kenya)、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以下簡稱ECOWAS)、南非(South Africa)和衣索比亞(Ethiopia)。這些來自非洲區域的第三方行為者，扮演著重要的領導角色。「非洲大國與區域型國際組織，相較於其餘第三方行為者，更善於協助任務駐在國締結有效、持久的和平協議。非洲第三方在維和任務中具領導作用，而其他行為者則以資金、軍事資源從旁協作。爰此，非洲和其他第三方(non-African)可以更有效地解決非洲國家內戰」(Duursma 2017, 612)。Mikulaschek(2019)也針對非洲國家在擔任安理會輪值主席時，如何與大國共享權力進行研究，並發現當非洲國家擔任主席並主持有關維和行動的決議案時，部署的人員數額與編列預算都相對較高，而這有助於維持非洲的和平穩定與安全。

#### 第四節 研究設計

Heldt(2005)主張可以將任務執行的持續時間按年份作分析單位，考慮各任務間執行速度的差異上，如何改變目標國家的民主得分，並觀察這種改變是否隨著時間的推移更顯著。而Diehl(2016)提出維和任務與駐在國民主化存在正相關的學術研究，均將研究設計限制在小範圍時間內及少任務部署地點上。因此，本文與相關研究的不同之處在於，採納1958年至2020年間所有執行完畢之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藉以瞭解任務對駐在國民主化的影響力。

本文將任務完畢時駐在國民主得分，減去任務開始前的民主評分，用以檢視駐在國的民主變化。<sup>10</sup>由於總計70次維和任務中，12團至今仍在執行，58團執行完畢。考量數據完整性，本文刪除12團正在執行中任務，16團位於兩個以上國家執行之任務，僅保留42團任務作為研究樣本並以表1.1呈現。

5. 建設和平，包括衝突後解除武裝和復員。
6. 人道主義援助，減輕衝突地區難民問題，並減少重大自然災害對會員國國民的傷害。
7. 非洲聯盟和平及安全理事會的其他授權決議。

10 本文作者為使讀者閱讀方便，另將Polity V民主評分轉換為1至21分級距。意即得分-10分者為1分，得分0分者為11分，得分10分者為21分。



表 1.1 本文研究樣本

編號	任務代號	地區	設立年份	Polity V 評分	終止年份	Polity V 評分	民主化 成果
1.	UNOGIL	黎巴嫩	1958	12	1958	12	0
2.	ONUC	剛果民主共和國	1960	11	1964	5	-6
3.	UNYOM	葉門	1963	11	1964	11	0
4.	DOMREP	多明尼加	1965	11	1966	8	-3
5.	UNAVEM I	安哥拉	1989	4	1991	7	3
6.	UNAVEM II	安哥拉	1991	7	1995	8	1
7.	UNAVEM III	安哥拉	1995	8	1997	5	-3
8.	MONUA	安哥拉	1997	5	1999	5	0
9.	UNTAG	納米比亞	1989		1990	17	
10.	ONUSAL	薩爾瓦多	1991	17	1995	18	1
11.	UNAMIC	柬埔寨	1991	8	1992	10	2
12.	UNTAC	柬埔寨	1992	10	1993	12	2
13.	UNOSOM I	索馬利亞	1992	11	1993	11	0
14.	UNOSOM II	索馬利亞	1993	11	1995	11	0
15.	ONUMOZ	莫三比克	1992	5	1994	16	11
16.	UNOMIL	賴比瑞亞	1993	11	1997	11	0
17.	UNAMIR	盧安達	1993	4	1996	5	1
18.	UNMOT	塔吉克	1994	5	2000	10	5
19.	UNCRO	克羅埃西亞	1995	6	1996	6	0
20.	UNMOP	克羅埃西亞	1996	6	2002	19	13
21.	UNPREDEP	北馬其頓	1995	17	1999	17	0
22.	UNMIBH	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	1995		2002		
23.	MINUGUA	瓜地馬拉	1997	19	1997	19	0
24.	UNMIH	海地	1993	4	1996	18	0
25.	UNSMIH	海地	1996	18	1997	18	0
26.	UNTMIH	海地	1997	18	1997	18	14
27.	MIPONUH	海地	1997	18	2000	9	-9
28.	MINURCA	中非共和國	1998	16	2000	16	0
29.	UNOMSIL	獅子山	1998	11	1999	11	0
30.	UNAMSIL	獅子山	1999	11	2005	16	5
31.	UNTAET	東帝汶	1999		2002		
32.	MONUC	剛果民主共和國	1999	11	2010	16	5
33.	UNMISSET	東帝汶	2002	17	2005	17	0
34.	MINUCI	象牙海岸	2003	11	2003	11	0
35.	UNMIL	賴比瑞亞	2003	12	2018	18	6
36.	ONUB	蒲隆地	2004	16	2006	17	1
37.	UNOCI	象牙海岸	2004	11	2017	15	4
38.	MINUSTAH	海地	2004	11	2017	16	5
39.	UNMIS	蘇丹	2005	8	2011	9	1
40.	UNMIT	東帝汶	2006	18	2012	19	1
41.	UNSMIS	敘利亞	2012	2	2012	2	0
42.	MINUJUSTH	海地	2017	16	2019		

資料來源：UNDPO(2021)、Marshall & Gurr(2020)。

說明：黃底欄位為本文第四章個案分析樣本。

本文採兼具質性方法與量化方法的混合研究設計，盼證明當代維和任務除了確保駐在國平民安全、控制衝突邊界、執行警察任務外，對於協助政府恢復治理能力之餘，尚有轉型駐在國政權型態，發展民主政治的功用。

承本文核心論述，維和任務對駐在國民主化的影響取決於派遣團軍文比例、中央政府與叛軍關係、叛軍導致的政權碎裂問題、治理能力差異下的脆弱程度與區域型國際組織及第三方行為者影響等要件。有關第三章量化分析部分，本文採用一般最小平方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method)，並發展三項研究假設：

H1：當派遣團成員軍文比例中文職愈高，將有助於建構和平、改革政府制度，則駐在國受介入後民主化程度愈高；

H2：當任務駐在國內叛軍數額越少，象徵政權碎裂程度越低，則駐在國受介入後民主化程度愈高；

H3：當任務駐在國治理能力改善，代表脆弱程度降低，則駐在國受介入後民主化程度愈高。

有關第四章個案分析部分，考量變數搭配研究方法的適切性，本文發展發展第二種研究理論，從國際層次出發，檢視任務執行過程中與結束後，是否存在區域型國際組織與第三方行為者的干預、介入。再從國內層次著手，衡量交戰團體、國內政府自身對任務駐在國民主化的影響。選擇個案時本文採用多樣案例法(diverse case)挑選樣本(Durch, 1993； Fetherston, 1994； Seawright & Gerring, 2008； Bara & Lisa, 2020)。首先挑選的第一個國家是海地，海地於1997年維和任務結束時，民主評分變化差異為+14分，顯示國內民主政治改善。再來列為樣本的國家是克羅埃西亞，2002年駐克羅埃西亞任務結束時民主化差異為+13分，民主表現同樣巨幅改善。最後挑選的負面案例是海地，2000年任務結束時海地的民主評分變化為-9分，民主政治明顯倒退。故本文以上述兩國三個時間區段的維持和平行動進行討論。

採用樣本個別為：

1. 聯合國海地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Haiti)、聯合國海地支助團 (United Nations Support Mission In Haiti)、聯合國海地過渡時期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 Mission in Haiti)。<sup>11</sup>
2. 聯合國克羅埃西亞恢復信任行動(United Nations Confidence Restoration Operation)、聯合國普雷夫拉卡觀察團 (United Nations Mission of Observers in Prevlaka)。
3. 聯合國海地民警特派團(The United Nations Civilian Police Mission in Haiti)。

藉由選用上述民主化得分差異的最大值、次大值與最小值作為研究樣本，試圖釐清為何皆有維和任務介入，民主化的差異卻如此巨大，細究影響任務成效的要件。

### 一、使用資料庫、概念化及操作化定義

根據學者見解(King, 1997；Press 2003；Coan & Mirya, 2008)，本文對變項間相關性的研究屬於總和層級的假設推論(aggregate-level inferences)，因此適用總和關係(aggregate relationships)，將不被用來解釋個別關係(individual relationships)。

為了要回答維持和平行動在何種條件下能促進民主化，或誘發民主化發生，本文使用諸多資料庫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其中變項資料來源的差異可能影響到統計結果的效度(Sayrs, 1989；Coan & Mirya, 2008)。因引，作者將以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對各國評分，作為 Polity V 以外的第二項民主化依據，進行統計模型上的穩健性檢驗。<sup>12</sup>

針對派遣團成員的軍文組成比例，本文使用國際和平研究院(International Peace Institute) 出版，由 Perry & Smith(2018)整理 1990 年至 2018 年間的維和任務數據，藉以檢視各項任務中的軍文比例差異。

針對任務駐在國碎裂程度，本文以其境內具備「武裝勢力」叛軍的數量量測，藉此得知該國的碎裂程度。Cunningham(2006)將衝突者定義為「在國內政策上擁

---

11 由於本文個案海地官方語言為法文，在研究其國家內政時可能面臨困難。如憲法是否保障民眾集會結社自由？是否開放成立政黨、民營新聞媒體？參政與投票制度、選舉競爭性？為了回答這些問題，作者以英文文獻進行補充。

12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於 1950 年出版「自由資產負債表(Balance Sheet of Freedom)」。這份報告評估全球各國政治趨勢及其對個人自由的影響。1972 年自由之家開始出版《自由比較研究》(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Freedom)，為世界各國的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評分，最新版年度報告為《2020 世界自由調查報告》(Freedom in the World 2020)。

有否決權的軍政府」。本文使用 Cunningham et al.(2020) 於 2019 年首次公開出版的反抗策略數據計畫(Strategies of Resistance Data Project)，該計劃統計全球 76 個內戰國家境內的軍政府數額，包含 1960 年至 2005 年間共 1124 個反抗組織的資料。

針對駐在國脆弱程度，本文根據體系和平中心(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Marshall & Elzinga-Marshall 於 2018 年出版的國家脆弱指標(State Fragility Index and Matrix)，取得 1995 年至 2018 年間共 167 個國家的脆弱評分。

最後，本文使用 IBM 的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SPSS)25，作為檢視變項間相關性之統計軟體。

## 二、研究限制

Doyle & Nicholas(2000)、Montgomery(2000)、Andersson(2000)、Sotomayor(2002)、Mosquera(2011)、Ari & Theodora-Ismene(2020)、Adhikari(2020) 等人認為參與維和任務能促進、刺激派遣國自身的自由民主制度。而 Smith(1996)、Gelpi(1997)、Pickering & Kisangani(2005)、Cunliffe(2018)、Albrecht(2020)的實證研究則發現參與維和行動將使派遣國民主倒退，與「民主轉移和平論」(Democratic Diversionary Peacekeeping)相悖。儘管派遣國自身民主政治的發展與國際社會民主進程研究相關，但考量本文研究假設聚焦於任務駐在國，故將不討論任務派遣國參與行動後，對自身民主制度的正負面影響。<sup>13</sup>

此外，由於爭端持續時間不一致，Beardsley & Lo(2014)發現「衝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越長，行動與對駐在國內交戰雙方達成不對稱讓步(asymmetric concessions)的效果越顯著」(Beardsley & Lo 2014, 376)。<sup>14</sup>因此，部署時間的長短會影響到本文研究標的「駐在國民主化」成效。然本文對變項相關性研究屬於總和層級的假設推論，因此無從避免爭端持續時間不一致的問題，故在此節說明。<sup>15</sup>

---

13 Albrecht(2020)認為參與維和行動有利於一國威權政府掌控內政，在任務中派遣部隊、供應資金，可以被解釋成政治大國或區域強權的經濟尋租行為與地理戰略考量(economic rent-seeking and geostrategic)。透過參與行動在特定面向上壟斷社會資源，進行非生產性的尋利活動，結果是有助於威權政府鞏固治權。

14 Beardsley & Lo(2014)發現對爭端雙方具有拘束力的衝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有助於中央政府與叛軍間獲得不對稱讓步(asymmetric concessions)，而仲裁(arbitration)和裁決(adjudication)的效力又大於調解(mediation)。

15 Diehl(2016)提出研究維持和平行動議題的學者中，偶有透過操作化任務執行時間，使統計結



探究軍文比例對任務駐在國民主化的影響時，比例轉變的「時機點」應被考量。如前所述軍職比例較高的派遣團，有助於終止衝突、促使交戰雙方簽署和平協定。文職比例較高的派遣團則有利於改革駐在國政府制度、建構國家長久和平。然而，由於本文採用統計方法檢視變項間的線型迴歸關係，無法凸顯各樣本中文職比例高於軍職比例「時機點」轉變的年份，故將此研究設計上的闕漏於本結說明。

另一方面，「一項維持和平行動是否應該授權執行？」此聯合國安理會及大會在選擇任務駐在國時面臨的選擇誤差(selection problem)問題，也是本文無法處理的議題。舉例來說，東帝汶於 1999 年舉辦公民投票試圖從印尼獨立時，面臨嚴峻國內動盪。為此，聯合國共派駐兩團維和任務協助穩定東帝汶境內局勢。<sup>16</sup>同時，1998 年至 1999 年間中非共和國分別舉辦國會與總統大選，聯合國安理會派遣維和任務前往居中調解黨派紛爭。直至今日，安理會於 2014 年 4 月 10 日部署的聯合國中非共和國多層面綜合穩定團(United nations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ed stabilization mission in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仍在運作中。該派遣團負責保護中非共和國平民、推動國內人權正義與法治、解散武裝部隊，及協助叛軍重返社會等任務。<sup>17</sup>「於何地執行任務？是否應持續執行任務？」的問題無法於本文中得到解答，因此作者將維持和平行動研究中存在的選擇誤差(selection problem)放在研究限制中，提供讀者有一定程度的認知與理解。

最後，各項任務宗旨不同，包含停止爭端雙方發動武裝攻擊的和平建構，或舉辦透明選舉盼恢復駐在國治理能力。因此，並非每個維持和平行動授權，皆包含建立民主政權的意涵。根據聯合國前秘書長哈馬紹(Dag Hammarskjöld)於 1958 年向大會提交《聯合國緊急部隊籌組與檢討報告》(Summary Study of the Experience Derived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Emergency Force)及 UNDPO 於 2008 年出版的《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指導方針》(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同意、中立與非使用武力乃維

---

果符合作者主觀預期，因而呈現抽樣偏差(selection bias)。

16 分別為 1999 年聯合國東帝汶過渡行政當局(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al Administration in East Timor)與 2002 年聯合國東帝汶支助團(United Nations Mission of Support to East Timor)。

17 分別為 1998 年聯合國中非共和國特派團(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與 2014 年中非共和國多層面綜合穩定團(United nations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ed stabilization mission in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和行動的三項基本執行原則。意即任務派遣團在取得地主國同意後方能介入，授權內容僅限於阻止交戰雙方軍事衝突、監督停火，而任務執行過程中應避免使用武力，且僅能在生命安全危及時使用武器。Beardsley & Schmidt(2012)也在研究聯合國面對國際衝突時，提出其採取的手段由溫和至激烈分別為：

1. 不介入/討論但不議決(no involvement / discussion only)
2. 消極外交：斡旋、倡議與譴責(passive diplomacy: good offices / call for action / condemnation)
3. 積極外交：調解、事實調查(active diplomacy: mediation/fact-finding)
4. 制裁(sanctions)
5. 觀察特派團(observer mission)
6. 維和特派團(peacekeeping)
7. 依據聯合國憲章的執法行為(enforcement)( Beardsley & Schmidt 2012, 40)。

因此當採取的手段越激烈，恢復和平所需的時程相對越短。本文作者認為當國際社會的介入手段屬於第六項—維和特派團與第七項—依據聯合國憲章的執法行為等性質時，在聯合國介入下建立的民主進程也將隨之加速。聯合國前秘書長蓋里(Boutros Boutros-Ghali)於 1992 年向安理會提交的報告《和平議程》(An Agenda for Peace)中，則提到國際社會介入衝突地區的四種模式：

1. 預防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
2. 維持和平 (peacekeeping)
3. 製造和平 (peacemaking)
4. 衝突後的重建和平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隨著區域型國際戰爭逐漸消弭，常見的衝突型態轉變為內戰，尤以非洲、中東與拉丁美洲的次數與規模最為顯著。因此，在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專家小組(Panel on United Nations Peace Operations)經由小組主席拉赫達爾·卜拉希米(Lakhdar Brahimi)的領導下，UNDPO 再於 2000 年提出《卜拉希米報告》(Brahimi Report)。對維和行動提出具體、務實的改革建議：

1. 呼籲會員國對預防外交、維持和平和建設和平的政治承諾
2. 聯合國維持和平部的機構改革
3. 提高財政預算

屆此，UNDPO 各項任務的部署條件與 1945 年首項行動已有大幅差異。授權日趨複雜、派遣團規模也會隨決議需求調整。本文作者發現，不同時代的維和行動就有不同的部署前提與操作模式，從非武裝觀察員為主的監測停火，到允許部隊成員在自衛前提下合理使用武力，直至當代放寬用武限制並擴大任務授權。部分學者對維持和平行動取得共識，「任務授權和執行文化(mandates and operational cultures)是影響行動成效的前因，而強制執行(enforcement mandates)往往比監督停火(monitoring)更有助於建構規範(building norms)」(Mironova & Whitt 2017, 2095)。本文作者已認知到維和任務授權存在差異，但考量使用統計方法時觀察值數額的多寡，未再將任務授權進行分類，因此無法排除授權差異對本文研究變項關係的影響，故臚列在研究限制中。<sup>18</sup>



---

18 有關於維持和平行動任務授權的轉變對任務成效的影響，可以參考 Hunt(2017)。

表 1.2 維和任務授權以兩時間段三性質呈現

年代	事件	任務性質
1945 年至 1991 年 冷戰時期	1948 年聯合國首次授權任務：停戰監督組織 (United Nations Truce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 1958 年秘書長哈馬紹向大會提交《聯合國緊急部隊籌組與檢討報告》，確立同意、中立、非武力使用三原則。	針對國家間戰爭的預防外交
	1992 年秘書長蓋里向安理會提交《和平議程》報告。	國際衝突發生時的： 1. 預防外交 2. 維持和平 3. 製造和平 4. 衝突後的重建和平
2000 年後 後冷戰時期	2000 年 UNDPO 提出卜拉希米報告，提供維和任務的改革建議。	1. 呼籲會員國對衝突後重建和平的政治承諾 2. 進行機構改革 3. 提高財政預算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 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針對維和行動與駐在國民主化進行文獻回顧，第一部分整理維和任務促成駐在國民主化的論點。第二節探討不認同維和任務能促進民主體制的論點。末節在現有理論基礎上，經由一般最小平方法與多樣案例法，發展「任務學劃駐在國民主進程」的研究理論。

### 第一節 維和行動促進任務駐在國民主化

學界認為維和行動對駐在國有諸多正面影響，如維持穩定和平、建立監管機制與紀律、保護平民(Doyle & Nicholas, 2000； Fortna, 2004； Holt, Glyn & Max, 2009； Hultman, Jacob and Megan, 2013； Carnegie & Christoph, 2020)等。

Doyle & Nicholas(2000)認為聯合國授權的維和行動與內戰後國際社會民主化有正相關，多邊執法行動可以成功終止暴力。依據 Doyle & Nicholas(2000)的研究，建設和平的成功要件取決於衝突的類型及駐在國的內政情況。而內政情況包含地方叛亂團體、民兵的數量(local roots of hostility)，與駐在國政府的改革能力(local capacities for change)。另一項重要條件，則是國際社會對實踐永續和平的承諾(th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 available to assist sustainable peace)。Fortna(2004)聚焦於衝突再發生(conflict reoccurrence)與和平的持續，提出國際社會與維和任務對民主化沒有明顯的積極或消極影響。當一國發生內戰，維持和平已相當困難，要使該國走向民主政體更是充滿挑戰。派遣團被期待在短期內將一個政治制度、經濟基礎設施及社會結構被內戰摧毀的國家轉為穩定，但經費、裝備和人員的不足已讓任務成效大打折扣，更遑論在戰後促進其國內社會民主化。也有樂觀的見解如 Marten(2004)發現由於當代任務與傳統行動有所不同，故能更有效地解決衝突。具備武力授權的維和部隊能遏止叛軍的暴力行為，而功能各異的派遣團再透過監督選舉、經濟重建等方式重建駐在國內政治和法律制度。

然而，駐在國國內的穩定和平未必等同於民主，因此本節將分成兩個部分進行文獻回顧。首先認識國際社會執行維和任務的動機，再介紹派遣團在內戰中扮演的協調角色，經由達成爭端雙方訴求減少國內社會動盪，並在改善叛軍與中央關係後促進民主。

「面對冷戰後地域性威脅的擴散，聯合國透過維和行動建立國際社會秩序和監管機制，而非民主政權被認為是潛在的威脅」(Zanotti 2006, 150)。爰此，促使

非民主政權轉型為民主國家，是維持和平穩定的手段之一。Zanotti(2006)認為聯合國透過維和行動干預失敗國家，協助該國政府履行公共行政職能，藉以達到維持和平穩定的目的。而在恢復政府職能的過程中，有助於駐在國的政治體制質變、改革。前國際法院法官 Buergenthal (1997；2006)也同意當國際社群將國際法治、人權保護、民主和多元等價值視作國際社會合作與互動時的必要條件，那麼一國內舊有的政治制度將改變。

有關於聯合國執行維和任務的動機，學者如 Montgomery(2000)、Andersson(2000)、Sotomayor(2002)發現各國參與行動與促進國際社會民主化有關。「國家參加維和行動乃出於自身利益，行動將促進民主的擴散，從而締造長久的和平。民主國家利用聯合國維和行動，轉型非民主國家來實踐全球和平與安全」(Andersson 2000, 19)。若能將越多的國家轉型為民主體制，維持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體系，現存民主國家將會是體系中最大的受益者，因此維和行動成為民主國家促進民主擴散、增強自身安全的手段。

當學界對維和任務效能提出質疑，Beardsley(2013)反駁聯合國可以透過外交手段與制裁(diplomatic engagement and sanctions)締造短暫和平。再者，維持和平行動對世界各地衝突的介入，也有助於促進長期的穩定。而 Carnegie(2015)、Carnegie & Christoph(2020)也針對國際組織中的權力分配及強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進行討論。具影響力的大國在聯合國場域中發揮槓桿作用，如在其偏好的地點部署更多維和人員。透過保護平民、減少傷亡、運送援助物資、修建道路與橋樑等基礎建設實踐人道主義。並讓維和任務扮演建設和平的角色，如於駐在國建立穩定財政機制、協助經濟發展；指導失序國家的治理行為，如訓練當地警察、監督選舉以及司法改革。這些維持穩定的手段，為的是促進駐在國的民主化，並進一步確保全球和平安全，最終使大國自身獲益。

對於能否在部署維持和平行動的國家內建立自由民主制度，Mosquera(2011)認為維和任務的性質有些相似《聯合國憲章》的託管制度，雖然維和行動在執行過程中可能違反《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7項—不干預國家內部事務的規定。<sup>19</sup>但國際社會應廣泛接納，甚至鼓勵維和任務作為穩定世界自由和平發展的工具，第四次民主化浪潮或許將發軔於當代維和任務。

---

19 本憲章不得認為授權聯合國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且並不要求會員國將該項事件依本憲章提請解決；但此項原則不妨礙第七章內執行辦法之適用(UN Charter, 1945)。

學者如 Collier, Ibrahim and Nicholas(2000)、Wall & Druckman(2003)、Andrea, Theodora-Ismene and Han(2013)、Mironova & Whitt(2017)、Ari & Theodora-Ismene(2020)研究叛亂團體對國內社會造成的分裂與動盪，提出維和行動能在內戰中扮演協調者的角色，並有效減輕國家分裂對社會穩定的不利影響。由於「利益相左的行為者讓國家難以形塑政策，各方爭取治權使國家政權碎裂，故一國內戰持續不斷」(Ari & Theodora-Ismene 2020, 617)。因此「來自聯合國的第三方制裁，可以通過遏制機會主義、提高訊息透明度、鼓勵誠信與聲譽等手段，來促進叛亂團體的正向社會行為並增強社會規範」(Mironova & Whitt 2017, 2095)。「當一國發生內戰，只要政權分裂的情形不嚴重，代表社會破碎的程度較小，外部行為者如區域型國際組織、地方大國、利益團體可以協助斡旋調停。但當一國政權碎裂程度嚴重時，聯合國派遣團的助益較區域型國際組織或地方大國顯著。維和行動透過促進交戰雙方之間的協調與溝通，傳達承諾的重要性。包括改善資訊不對稱、制裁破壞協議者、降低叛亂團體間達成協議後卻未遵守的承諾問題(commitment problem)，進而大幅縮短暴力的持續時間和衝突程度」(Ari & Theodora-Ismene 2020, 618-619)。根據上述見解，維和行動能扭轉碎裂化國家中政權動盪對國內社會的負面影響，進而達成穩定和平的目的。

內戰國家中叛亂團體、民兵組織(militias)的主要訴求是對抗政治菁英並爭取治理權力。Walter(2015)提出維和行動建立的良善政府機制，能打破爭權奪利的惡性循環，取代內戰國家中的補充機制(supplementary mechanism)，進而降低內戰重複發生的機率。<sup>20</sup>因為開放的政治環境和法律制度能有效制約行政權力、鼓勵執政者進行改革。<sup>21</sup>所謂的政府治理能力，包含保障公眾參與(public participation)、成文憲法下的法治精神(rule of law with written constitution)等意涵。<sup>22</sup>「制度化的治理機制使公民能依循檢查政治人物的公務行為，監督政治精英實踐改革承諾」(Walter 2015, 1264)。

---

20 根據 Walter(2015)由於內戰國家中沒有完善的政治體制，立法、行政、司法部門間權力分立、抗衡的機制不存在。故多發展出民兵組織與政治精英間衝突不斷的補充機制(supplementary mechanism)。

21 Walter(2015)認為政府治理能力與行為(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會影響到和平持續的時間(peace duration)。長遠來看，內戰終止的關鍵取決於政治因素。「世界銀行(World Bank)與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對內戰國家的貸款援助有助於其經濟成長，短期的維持和平行動也能恢復國家穩定。但這些都無法取代制度化政府(institutionalized governments)之於和平、民主的重要性」(Walter 2015, 1264)。

22 如我國行政程序法、行政罰法、公務人員選舉罷免法對行政權的約束，及監察院糾正行政機

亦有學者細究政府—軍事單位的關係。<sup>23</sup> Albrecht(2020)發現「派遣團能作為中央政府與地方軍官間的協調者，當地方勢力密謀叛亂時擔任政府與叛軍間的溝通橋樑。其次，中央政府無需增加軍事預算，即可在派遣團的協助下重新分配物質資源，安撫地方軍官對先前資源分配不公的不滿情緒。再者，維和行動具體的培訓方案，能促進一國政府、軍事機構制度化。而此制度化過程有助軍官培養職業道德，使軍閥去政治化」(Albrecht 2020, 586)。

根據上述各說，評估聯合國維和任務對民主進程的影響時，作者發現應充分考量任務駐在國中政權分裂所致障礙。當派遣團扮演好溝通橋樑、重新分配物資改善駐在國中央政府與叛軍關係，或是協助軍事機構制度化、培養軍人職業道德，都有助於改善政府與叛軍的溝通與承諾問題，並促進政府改革。因此作者肯定維和行動在民主進程的功用，而作下圖整理。

維和任務在民主進程中的助力，可區分成下述幾個面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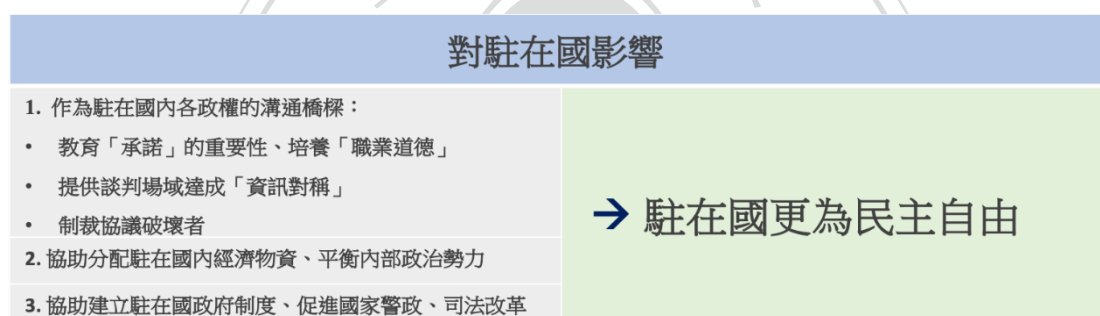


圖 2.1 維和任務有助於駐在國民主化的因素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 第二節 維和行動延宕任務駐在國民主進程

本文作者認為體制改革、司法正義、人權保障以及清廉施政是評斷一國政府是否充分發揮功能的指標，而維和任務不僅身兼穩定社會和諧的角色，還具備推進駐在國政治改革並促成國際社會民主化的能力。<sup>24</sup>但各個任務執行的成果迥異，甚至會受當地社會抵制與威權反噬。

關、彈劾及糾舉公務人員等機制。

23 請參考 Owens 對政府—軍事單位關係的定義為：「在民政與軍事機構間，職責與特權的分配 (the allocation of prerogatives and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ilitary)」(Owens 2012, 1)。

24 有關民主政體與和平穩定的社會，請參考 Maoz & Russett(1993)、Fearon(1994)等人提出的「聽眾成本」(audience cost)理論以及 Bueno de Mesquita et al.(1999)提出的「遴選集團」(the selectorate)理論。



Nye(2019)、Mearsheimer(2019)等人指出，西方國際社會欲在第二、第三世界促進民主政治發展、推廣民主與自由價值，但此等民主外送的舉措已然失敗。首先，如 Hegre et al.(2001)提出推動民主化將擴大駐在國內戰規模，且軍事干預後建立的民主成果往往是短暫的。又或者如 Wantchekon(2004)的觀察發現，民主程度的提高與內戰持續的時間長短呈現正相關。

另一方面，Neack(1995)、Marten(2004)、Stojek & Tir(2015)質疑國家參與維和行動的動機，反駁「維和行動是實踐世界和平的理想」此論點。一項經由聯合國決議的任務，背後象徵國際社會的支持與認可。有別於新帝國殖民主義，維持和平行動應屬民主外送的善舉。然 2003 年美國對伊拉克極權政府的干預行為，就被指控項莊舞劍，意在伊國境內的天然資源。「藉由聯合國維和行動的包裝，美國成功創造正面且合法的印象(perception of greater legitimacy)」(Stojek & Tir 2015, 361)。派遣國願意投入資金或人力，皆是因為任務成果與自身利益掛鉤。「先進的工業化西方國家在維和任務中佔主導地位，透過維持國際現狀來維護國家利益。參與行動可以向國際社會展現自身軍事實力，但是否能促進駐在國民主轉型有待商榷」(Neack 1995, 181)。而 Marten(2004) 將聯合國於海地、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科索沃和東帝汶執行的維和行動，與當代民主國家英國、法國和美國在二十世紀初的殖民佔領行為作比較。指出維和任務乃帝國主義殖民佔領再現。「複雜的維和行動與西方國家的殖民歷史，事實上有許多相似之處。當今維和人員執行的軍事任務在許多方面都類似於殖民時代。兩種類型的干預都試圖使駐在國/殖民地西化(adopting Europea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values and institutions)」(Marten 2004, 16)。

綜觀上述，認為維和任務無利於駐在國民主進程的觀點不在少數。本節分成兩個部分進行文獻回顧，首先爬梳維和任務如何延宕駐在國民主化，接著檢視維和任務與惡化的中央政府與叛軍關係。

由於維和行動需要駐在國政府的知情同意，還要顧及該國國內民意輿論的支持與否，因此複雜的維和行動要比殖民時代更難民主化目標國家。舉例來說，「當聯合國東帝汶過渡行政當局(The 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al Administration in East Timor，以下簡稱 UNTAET)任務授權從「維持和平」擴增為「保障公民社會權利」和「促進東帝汶經濟發展」時，國內輿論認為 UNTAET 缺乏組織管理、浪費資源且效率低落」(Marten 2004, 143)，因而影響任務的執行。尤其當駐在國社會對

於國家未來發展方向存有矛盾時，維和行動將揭露該國國內社會中的認知差異，使社群間的矛盾高漲，因而提高推動民主化的難度。

同時，當國際社會對於維和任務授權的認知改變，期待行動帶來更複雜、全面的影響力，聯合國時常失去維繫任務通則性的能力。由於維和行動的合法性來自於聯合國安理會、大會的決議，這份授權是經過多邊談判的結果，受制於國際共識。「囿於多邊主義使協調困難，各個維和任務的目標最終變得不一致(maintain cohesion over operations)且難以預測」(Marten 2004, 144)。也就是說維和行動是國際社會角力的結果，協商過程中需各方讓步，因此民主化力道非一蹴可及。

也有學者聚焦駐在國對國際援助的依賴性，探討為何一旦外援結束、任務終止，民主成果將迅速倒退。Zanotti(2006)指出由於海地未能遵守國際社會的民主改革標準達成轉型，以致資金撤出，代價高昂的民主改革頃刻中斷，維和行動帶給駐在國的民主化成果最終未能持續發酵，反而引起動盪和不穩定。<sup>25</sup>另一例是克羅埃西亞，克國政府為了符合維和行動制定的人權保障標準，實施激烈的體制改革、社會資源重新分配，卻使未被分配到資源的社會部門萎縮，國家更為動盪。<sup>26</sup>「儘管克國中央政府為加入歐洲聯盟制定政治改革計畫，但國內少數地區仍因種族隔閡而衝突頻發。地方政府若跟進改革，將違背其選區利益，因此最後中央政府推動的民主進程面臨地方政治阻力」(Zanotti 2006, 161)。由此可見，阻礙公民參與政治、實現社會正義的根本原因，是駐在國內複雜的階級制度與種族衝突，這些國家民主化的桎梏往往存在已久，非國際外力能根除。

再者，針對中央政府與叛軍關係，Hunnicut & William(2019)發現駐在國民眾對維和人員的暴力行為，會隨著任務介入程度提高而激增，弱化民主轉型的效力。<sup>27</sup>「駐在國叛軍對維和人員的暴力行為出於戰略動機。若能奪回派遣團代中央政

---

25 Zanotti(2006)研究中的 1993 年駐海地維持和平行動，為初部署的聯合國海地特派團(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Haiti, UNMIH)，而本文觀察海地民主政治變化時，將研究時段延續至 1997 年的海地內政。

26 克羅埃西亞共經歷四次維和任務介入干預民主進程，分別為 United Nations Confidence Restoration Operation(UNCRO)、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al Administration for Eastern Slavonia, Baranja and Western Sirmium(UNTAES)、United Nations Mission of Observers in Prevlaka(UNMOP)、United Nations Civilian Police Support Group (UNPSG)。而 Zanotti(2006)的研究聚焦在 1998 年 UNPSG 撤出後的克羅埃西亞內政，年代與本文研究時段不同。

27 Hunnicutt and William(2019)使用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非洲部署數據庫(Robust Africa Deployments of Peacekeeping Operations，以下簡稱 RADPO)，RADPO 記有 1999 年至 2018 年間，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區域內，十二個維和行動中人員駐點地理位置、任務性質、國籍及性別組成的資料(UNDPO, 2020)。

府提供治理的角色，自行維續公共安全，將有助於提高民眾對自身的支持，並證明叛軍具備跨縣市的治理能力，最終取得權威合法性」(Hunnicut & William 2019, 22)。<sup>28</sup>

根據 Neack(1995)、Marten(2004)、Wantchekon(2004)、Hunnicut & William(2019)等學者見解，任務駐在國與維和行動的依賴關係未必能讓一國政府成熟、自主地發展。且維和行動的介入甚至會惡化中央政府與叛軍關係，使民主倒退發展。因此，作者作下圖整理。

維和任務對民主進程造成的阻力，區分成下述幾個面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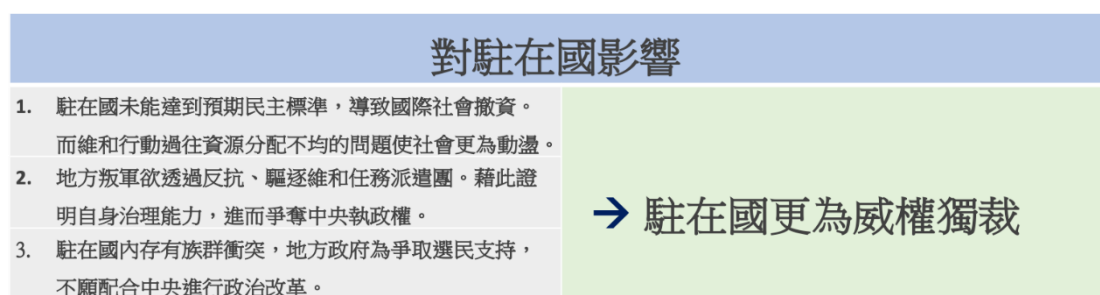


圖 2.2 維和任務無益於駐在國民主化的因素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 第三節 本文發展之研究理論

有學者批評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是政治強權役使派遣團的尋租行為，維和任務濫觴於區域大國的地緣政治考量。也有人針對任務駐在國政府改革可能性提出質疑。如 Fortna(2008)認為內戰時，保護平民安全、維持社會和平已很棘手，要在該國建立民主政體實屬不易。而 Jarstad(2008)也提出戰爭-民主過渡(war to democracy transitions)的概念，<sup>29</sup>「戰後和平建設(post-war peacebuilding)旨在建立永續的和平，而民主是絕佳的管理手段；對民主的期待促使決策者將民主化與建設和平視為相互正向影響」(Jarstad 2008, 18-19)。但事與願違，聯合國透過維持和平行動促進民主化的目標多數宣告失敗。駐在國政府與叛軍間議價能力的差異，使各國發展成權力共享的次佳民主成果，公民身份、政黨權力分配等議題多懸而

28 Hunnicutt & William(2019)也經由統計結果指出，由警務人員、非西方民主國家、女性維和人員等三種類別組成的維和派遣團，最容易受到駐在國叛軍的攻擊。

29 民主化是開放國內政治空間的過程，包括具競爭性的選舉、政治參與和人權提倡。當國際社會以民主化名義採取建設和平的行動，將對和平進程產生負面影響，並發生戰後過渡困境(post-war transitions dilemma)，對建設和平與民主化(peacebuilding and democratization)構成嚴峻挑戰。(Jarstad, 2008)。

未決。換言之「威權政體的轉型與民主化是一個冗長耗時的過程，而內戰後的民主化也必須伴隨國家建設，以及地方社群與個人在行為和態度的民主化轉變，才可能成功達成」(Jarstad 2016, 90-91)。

為此，本文希冀經由量化與質化研究方法，證明維和任務作為建設駐在國和平的重要性，而國際社會民主化又將發軔於國際社會的穩定。當 UNDP 挹注資金與人力資源於駐在國，協助建立財政機制與經濟發展，再以訓練警政體系、監督選舉並促進司法改革等手段擘劃、重整失序國家的治理行為，這些舉措皆有利於駐在國民主化。因此本文作者提出以下研究理論，當維和行動滿足要件時，便有利於推動駐在國民主化：

1. 首先是派遣團成員組成，派遣團成員的身份包含軍人、警察、及觀察員，當該次維和行動的軍文比例中文職較高時，任務達成駐在國民主化的成效越高。
2. 接著，當駐在國叛軍數額越多國內政權碎裂程度越高，中央政府與地方叛軍、民兵因資訊不對稱而彼此扞格，則維和任務的穩定和平成效越低。
3. 最後當駐在國的治理能力佳、脆弱程度低，如政府具合法權威、能有效提供安全保障、減少武裝衝突、發展國內經濟、促進社會和諧，則在維和任務介入下該國有望達成民主轉型。

表 2.1 影響維和任務成效的因素

內生性因素-維和派遣團變項	外生性因素-駐在國變項
	駐在國國內脆弱程度
派遣團成員的軍文比例	駐在國軍民碎裂程度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本文在發展研究理論時，認知到由於「區域型國際組織與第三方行為者」及「任務駐在國中央政府與叛軍關係」對維和任務成效的影響，屬於名目尺度(nominal scale)的變數，無法如軍文比例、碎裂程度、脆弱程度等比例尺度(ratio scale)變數適用至量化研究中。故作下表將衡量任務成效的指標依據內涵區分為國際、國內兩層次，以便個案分析時使用。



表 2.2 以國際與國內層次作任務成效衡量指標

編號	指標
國際層次—區域型國際組織與第三方行為者	
1	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展現一致決心支持解決衝突，如透過外交努力，監督交戰雙方談判進度，期望達成最終決議(conflict resolution)。
2	區域組織的協作，組織內會員國對解決衝突、恢復和平達成共識。
國內層次—任務駐在國中央政府與叛軍關係	
3	交戰雙方同意停火，並願意配合維和行動後續安排。
4	交戰雙方共同認知到衝突最終將以非暴力形式(non-violent means)解決，並期望國家恢復和平。

資料來源：Pushkina(2004)、Heldt & Wallensteen (2005)、Tardy (2015)。

說明：根據上述學者評估維持和平任務成功與否時，述及的各項指標所改良之表格。



## 第三章 量化分析

### 第一節 計量經濟模型

本文以一般最小平方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method, OLS)做為計量經濟模型。再者，考量自變數、依變數與控制變數之間恐存在互為因果的內生性問題(endogeneity concerns)，或是依變數影響自變數、控制變數的相反因果問題(reverse causality)(Bellemare, Masaki and Pepinsky, 2017)，本文對自變數與控制變數進行一年的延遲設定(lagged explanatory variables)，也就是以前年(2020年)維和行動派遣團的軍文比例，檢視隔年(2021年)任務駐在國於 Polity V 中的民主得分，藉此檢視維和任務對駐在國民主化的影響。

本文模型如下：

$$D = \alpha + \sum_{n=1}^7 \beta_n X_n + \varepsilon$$

模型中  $D$  是民主化依變數； $\alpha$  代表常數、截距項(intercept)，意指當所有自變數與控制變數為零時，依變數的數值。再者，恆等式的右方， $\beta$  是變項的係數； $X$  是本文的自變數與控制變數； $\varepsilon$  則是誤差值。

### 第二節 變數

#### 一、自變數

本文選擇軍文比例、碎裂程度、脆弱程度作為本文的自變數。

針對維持和平任務派遣團內，軍職人員與文職人員比例的資料庫將使用國際和平研究院(International Peace Institute)整理，自 1990 年至 2018 年間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數據，藉以檢視各項任務中派遣團軍文比例差異。根據 UNDPO 網站，各派遣團因任務授權差異成員組成有所不同。

成員類別包含：

1. 行政人員(staff officer)：由常駐代表團(permanent mission)提名並由軍事顧問辦公室(office of military adviser)選派。
2. 警務人員(police personnel)：包括特派警隊(specialized police teams)、一般警隊(formed police units)和個人警官(individual police officers)。

警務人員負責維持駐在國公共秩序，並協助確保聯合國駐外人員安全。

3. 軍事人員(military personnel)：包括聯絡官(military liaison officers)、觀察員(military observers)和參謀人員(military staff officers)。

Perry & Smith(2018)將派遣團成員分類成軍隊(troops)、警察(police)、觀察員(observers)三類。本文將警察與觀察員合併計做文職人員，並計算其在派遣團中所佔人數比例，得出各維和行動軍文比例。

針對內戰國家的碎裂程度，本文使用 Cunningham Kathleen Gallagher, Marianne Dahl and Anne Frugé 的反抗策略數據計畫(Strategies of Resistance Data Project)，Cunningham et al.(2020) 的反抗策略數據計畫包含 1960 年至 2005 年間 76 國共 1124 個反抗組織的資料。而本文計算駐在國境內的叛軍組織數額作為其碎裂程度。

針對內戰國家的脆弱程度，本文根據體系和平中心(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 出版 2017 全球報告：衝突、治理能力與國家脆弱度(Global Report 2017: Conflict, Governance and State Fragility)中的國家脆弱度指標與量表(State Fragility Index and Matrix，以下簡稱 SFI)，呈現各維和行動駐在國的脆弱程度。該報告由 Monty G. Marshall and Gabrielle Elzinga-Marshall 撰寫，目前涵括 1995 年至 2018 年間人口數達五十萬的 167 個國家。

評分指標包含：

1. 成效分數(effectiveness Score)、合法性分數(legitimacy score)、安全成效(security effectiveness)、安全合法性(security legitimacy)、武裝衝突指標(armed conflict indicator)、政治成效(political effectiveness)、政治合法性(political legitimacy)、政權類型(regime type)、經濟成效(economic effectiveness)、經濟合法性(economic legitimacy)、石油生產或消費淨額(net oil production or consumption)、社會成效(social effectiveness)、社會合法性(social legitimacy)、區域效應(regional effects)。
2. 評分級距為極度(extreme)—20 分至 25 分、高度(high)—16 分至 19 分、嚴重(serious)—12 分至 15 分、中等(moderate)—8 分至 11 分、低等(low)—4 分至 7 分、極少或幾乎不(little or no)—0 分至 3 分。

3. 本文將滿分 25 分的國家脆弱指標，轉制計算方式為 26 分-SFI，使 SFI 的方向性與 Polity V 民主得分及 Freedom House 民主得分一致。

## 二、依變數

本文的自變數為民主化程度，使用體系和平中心(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政體特徵與轉型資料庫(Polity V: Regime Authority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 Datasets)，Marshall & Gurr(2020)針對 1946 年至 2018 年間人口數達五十萬的 167 個國家進行民主評分。Polity V 對國家民主化的評分級距為-10 分至 10 分，本文將各樣本+11 分，使計算方式轉制為 1 分至 21 分，其方向性與 Freedom House 民主得分、SFI 脆弱指標一致。

本文再使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1973 年至 2021 年的世界自由度(Freedom In the World)評分作為第二種民主化得分，進行穩健性檢驗。

1.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國家與非自治領地評分與現狀(country and territory ratings and statuses)中，PR 代表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CL 代表公民權利(civil liberties)，PR 與 CL 評分級距為 1 分至 7 分，1 分為最高分，7 分為最低分。本文將 PR+CL，相加後除以 2，得出民主化分數。再轉制計算方式，以 8 減去此民主化分數，使其方向性與 Polity V 民主得分、SFI 脆弱指標一致。
2. 世界自由度(Freedom In the World)評分中，Status 代表自由現狀(freedom status)，F 代表自由(free)、PF 代表部分自由(partly free)、NF 代表不自由(not free)。

## 三、控制變數

本文以任務駐在國經濟表現、人口成長等變數作為量化分析的控制變數。透過控制人均所得變化、人口成長率多寡與駐在國受外國直接投資的金額，觀察在經濟與人口發展等變數存在的情況下，任務執行過程中軍文比例、碎裂程度、脆弱程度三種自變數，與駐在國民主化的關聯性。

針對上述控制變數，本文使用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世界發展指標(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取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 (current US\$))，以下簡稱 GDP per capita)、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成長率(GDP per capita growth (annual %))，以下簡稱 GDP per capita growth)、人口成長率(Population

growth (annual %), 以下簡稱 Population growth)與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t inflows (% of GDP), 以下簡稱 FDI)等數據。

#### 四、統計軟體

最後，本文使用 IBM 的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SPSS)25 進行簡單線性迴歸分析(linear regression)，檢視變項間相關性。



### 第三節 統計結果

表 3.1 描述統計表

變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觀察值	遺漏值
依變數						
Polity V 民主評分	12.67	4.427	2	19	174	29
Freedom House 民主評分	3.118	1.3245	1.0	6.0	178	25
自變數						
Police and observers' ratio	.39767477	.389079960	.000000	1.000000	138	65
Fragmentation	2.94	1.290	1	8	52	151
Fragility	9.09	5.145	2	22	134	69
控制變數						
GDP per capita	915.547050423	1090.6115375786	102.5979776	5640.3162480	167	36
GDP per capita growth	1.53516261966	11.586858623457	-47.503315990	92.201559100	163	40
Population growth	1.76471367408	1.756364414934	-6.766223086	5.509748793	185	18
FDI	4.94419186524	14.356219571532	-2.981627998	103.337387100	151	52

資料來源：UNDPO(2021)、World Bank(2021)、Freedom House(2021)、Marshall & Gurr(2020)、Cunningham et al.(2020)、Perry & Smith(2018)、Marshall & Elzinga-Marshall(2018)。

表 3.2 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和任務駐在國民主化關聯之統計結果

依變數 Polity V 民主評分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b>自變數</b>				
Police and observers' ratio	-.243 (1.086)			-3.655 (3.893)
Fragmentation		-.255 (.581)		.298 (1.084)
Fragility			.657*** (.093)	.654 (.454)
<b>控制變數</b>				
Log(GDP per capita)	2.083 (1.099)	-4.578 (2.491)	-2.614* (1.140)	-9.188 (5.596)
GDP per capita growth	.054 (.045)	-.157 (.112)	.008 (.047)	-.436 (.258)
Population growth	.704* (.290)	-2.547** (.739)	1.660*** (.353)	-1.818 (1.315)
Log(FDI)	-.230 (.553)	.132 (1.731)	-.261 (.463)	2.099 (2.064)
<b>其餘數值</b>				
常數項(截距)	6.389 (3.340)	29.556 (8.333)	11.788 (3.189)	35.882 (11.147)
R Square	.108	.403	.329	.635
觀察值	111	32	117	21

資料來源：UNDPO(2021)、World Bank(2021)、Marshall & Gurr(2020)、Cunningham et al.(2020)、Perry & Smith(2018)、Marshall & Elzinga-Marshall(2018)。

說明：

1. 各變項對應之直欄位為 $\beta$ 值，括弧內為標準差。
2. 作者針對 GDP per capita 與 FDI 取對數，再進行迴歸分析。
3.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首先在第一個模型中，作者將軍文比例(police and observers' ratio)放入一般最小平方模型，並發現依變數 Polity V 民主評分的 p 值 0.823 大於 0.05，不具統計結果上的顯著相關性。因此不拒絕虛無假設(null hypothesis)，對立假設(alternative hypothesis)不成立。故本文針對派遣團成員軍文比例與駐在國民主化程度的研究假設為誤，兩種變項間不存在顯著相關性。而控制變數人口成長率(population growth)的 p 值 0.017 小於 0.05，具備統計結果上的顯著相關性。

接著在第二個模型中，作者將碎裂程度(fragmentation)放入一般最小平方模型，並發現與依變數 Polity V 民主評分的 p 值 0.665 大於 0.05，不具統計結果上的顯著相關性。因此不拒絕虛無假設(null hypothesis)，對立假設(alternative hypothesis)不成立。故本文針對駐在國碎裂程度與駐在國民主化程度的研究假設為誤，兩種變項間不存在顯著相關性。而控制變數人口成長率(population growth)的 p 值 0.002 小於 0.01，具備統計結果上的顯著相關性。但本模型僅有 32 組觀察值，數值解釋力有待商榷。

在第三個模型中，作者將脆弱程度(fragility)放入一般最小平方模型，並發現依變數 Polity V 民主評分的 p 值 0.000 小於 0.001，具有統計結果上的顯著相關性。因此拒絕虛無假設(null hypothesis)，對立假設(alternative hypothesis)成立。故本文針對駐在國脆弱程度與駐在國民主化程度的研究假設為真，兩種變項間存在顯著相關性。且  $\beta$  值 0.657 為正值，顯示在維和行動介入後，駐在國脆弱程度逐漸降低，而該國民主得分也隨之提高。另一方面，控制變數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的 p 值 0.024 小於 0.01，具備統計結果上的顯著相關性。而人口成長率(population growth)的 p 值 0.000 小於 0.001，也具備統計結果上的顯著相關性。

最後在第四個模型，作者同時將軍文比例(police and observers' ratio)、碎裂程度(fragmentation)與脆弱程度(fragility)放入一般最小平方模型中，並發現使用 OLS 檢驗三種自變數與依變數 Polity V 民主評分的關聯性時，其 p 值皆大於 0.05，不具統計結果上的顯著相關性。

#### 第四節 穩健性檢驗

本節作者使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世界自由度(Freedom In the World)評分，替換 Polity V 對各任務駐在國的民主得分，進行穩健性檢驗。



表 3.3 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和任務駐在國民主化關聯之統計結果

	依變數 Freedom House 民主評分			
	Model 5	Model 6	Model 7	Model 8
<b>自變數</b>				
Police and observers' ratio	.124 (.325)			-.372 (.332)
Fragmentation		-.154 (.097)		-.049 (.114)
Fragility			.202 *** (.028)	.156 ** (.045)
<b>控制變數</b>				
Log(GDP per capita)	.903 ** (.342)	.550 (.419)	-.637 (.339)	-.351 (.550)
GDP per capita growth	.024 (.014)	.008 (.018)	.012 (.014)	-.042 (.025)
Population growth	.055 (.090)	-.584 *** (.122)	.261 * (.103)	-.260 (.161)
Log(FDI)	.013 (.172)	.023 (.298)	.065 (.137)	.460 (.256)
<b>其餘數值</b>				
常數項(截距)	.530 (1.039)	2.625 (1.406)	2.684 (.942)	3.182 (1.379)
R Square	.123	.809	.361	.917
觀察值	116	36	122	25

資料來源：UNDPO(2021)、World Bank(2021)、Freedom House(2021)、Cunningham et al.(2020)、Perry & Smith(2018)、Marshall & Elzinga-Marshall(2018)。

說明：

1. 各變項對應之直欄位為 $\beta$ 值，括弧內為標準差。
2. 作者針對 GDP per capita 與 FDI 取對數，再進行迴歸分析。
3.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首先在第五個模型中，作者將軍文比例(police and observers' ratio)放入一般最小平方模型，並發現依變數 Freedom House 民主評分的 p 值 0.702 大於 0.05，不具統計結果上的顯著相關性。因此不拒絕虛無假設(null hypothesis)，對立假設(alternative hypothesis)不成立，故穩健性檢驗與模型一的執行結果一致。另一方面，控制變數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 的 p 值 0.009 小於 0.01，具備統計結果上的顯著相關性。

接著在第六個模型中，作者將碎裂程度(fragmentation)放入一般最小平方模型，並發現依變數 Freedom House 民主評分的 p 值 0.123 大於 0.05，不具統計結果上的顯著相關性。因此不拒絕虛無假設(null hypothesis)，對立假設(alternative hypothesis)不成立，故穩健性檢驗與模型二的執行結果一致。而控制變數人口成長率(population growth)的 p 值 0.000 小於 0.001，具備統計結果上的顯著相關性。但本模型僅有 36 組觀察值，數值解釋力有待商榷。

在第七個模型中，作者將脆弱程度(fragility)放入一般最小平方模型，並發現依變數 Freedom House 民主評分的 p 值 0.000 小於 0.001，具有統計結果上的顯著相關性。因此拒絕虛無假設(null hypothesis)，對立假設(alternative hypothesis)成立。故穩健性檢驗與模型三的執行結果一致。且 $\beta$ 值 0.202 為正值，顯示在維和行動介入後，駐在國脆弱程度逐漸降低，而該國民主得分也隨之提高。另一方面，控制變數人口成長率(population growth)的 p 值 0.013 小於 0.01，也具備統計結果上的顯著相關性。

最後在第八個模型中，作者同時將軍文比例(police and observers' ratio)、碎裂程度(fragmentation)與脆弱程度(fragility)放入一般最小平方模型，並發現使用 OLS 檢驗三種自變數與依變數 Freedom House 民主評分的關聯性時，脆弱程度(fragility)的 p 值 0.003 小於 0.01，具有統計結果上的顯著相關性。但本模型僅有 25 組觀察值，數值解釋力有待商榷。

## 第四章 個案分析

本文於第三章經由統計模型檢視維持和平行動與駐在國民主化之間的關係，藉通則性研究取得對 42 個維和任務的一致性觀察。而計量模型主要欠缺的深度分析(in-depth analysis)，較無法理解各派遣團的細部運作。因此，本章以個案分析方式補足上述缺漏，盼將任務駐在國的國內政治背景帶入，探究軍文比例、碎裂程度、脆弱程度以外影響民主化的因素。個案挑選方式採用多樣案例法(diverse cases) (Durch, 1993； Fetherston, 1994； Seawright & Gerring, 2008； Bara & Lisa, 2020)，並將依序檢視民主化的成功案例與失敗案例。

### 第一節 成功案例

本節首先選擇自 1993 年開始執行的聯合國海地特派團(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Haiti)、1996 年接替的聯合國海地支助團(United Nations Support Mission In Haiti)、1997 年終止的聯合國海地過渡時期特派團(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 Mission in Haiti)三項任務，作為維和任務對駐在國民主化正向影響的案例。自 1993 年 UNMIH 介入至 1997 年 UNTMIH 退出，依據 Polity V 的評分海地共計有正分 14 分的民主得分變化。

表 4.1 於海地執行之維持和平行動

任務名稱	年代	民主得分變化
聯合國海地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Haiti, 以下簡稱 UNMIH)、聯合國海地支助團 (United Nations Support Mission In Haiti, 以下簡稱 UNSMIH)、聯合國海地過渡時期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 Mission in Haiti, 以下簡稱 UNTMIH) <sup>30</sup>	1993 年至 1997 年	+14

資料來源：UNDPO(2021)、Marshall & Gurr(2020)。

首先根據表 4.2 變數數據，海地在國際社會介入政變前的 Polity V 民主得分為 4 分。1994 年 UNMIH 涉入後情況大幅改善，提高至 17 分。而 Perry & Smith(2018) 的數據與本文研究假設不符，軍文比例與民主得分呈現負相關。1996 年 UNMIH 撤離 UNSMIH 接替時，文職比例人員降至 10%，海地內政情況隨派遣團內的軍職比例提高而增至 18 分。

再者，根據 Marshall & Elzinga-Marshall(2018)的脆弱指標，數據呈現結果與本文研究假設相符，當脆弱程度降低有利民主政治萌芽。1997 年 UNSMIH 撤離由 UNTMIH 接替時，海地的民主得分隨治理表現改善而有所提升。

30 1990 年海地舉行總統大選，在聯合國查核海地選舉觀察團 (United Nations Observer Group for the Verification of the Elections in Haiti) 的監督下，Jean-Bertrand Aristide 勝選。1991 年海地發生政變 Aristide 總統出走海外，聯合國安理會為恢復其憲政秩序於 1993 年 6 月向海地實施石油與武器禁運。同年 9 月 23 日聯合國依據安理會第 867 號決議成立 UNMIH，旨在協助海地軍事現代化並建立警政體系。1996 年海地再次舉行總統大選，René Préal 勝選政權順利交接。為穩固海地國家警察 (Haitian National Police, HNP) 制度，安理會於 1996 年 6 月 28 日依據第 1063 決議成立 UNSMIH 取代 UNMIH，任務內容包括 HNP 專業化訓練、建立司法制度、實踐國家轉型正義與經濟復甦。「1997 年 7 月 19 日聯合國秘書長 Kofi Atta Annan 對安理會發表海地情勢報告，安南認為海地在聯合國與國際社會的支持下情勢大幅進步，但仍面臨嚴峻的政治與經濟挑戰。職是之故，建議安理會對海地再次發起維和行動 UNTMIH，進一步強化 HNP 群眾管控、快速反應部隊與總統府維安等項目能力。UNTMIH 於同年 7 月 30 日在安理會第 1123 決議下成立，至 11 月 30 日停止運作」(邱稔壤 2012, 10)。

表 4. 2UNMIH、UNSMIH 與 UNTMIH 變數統計表

任務名稱	國家	任務年份	Polity V	自由之家	軍文比例	脆弱程度
UNMIH	HTI	1993	4	1	1992	
UNMIH	HTI	1994	17	3	1993	
UNMIH	HTI	1995	17	3	1994	0.819355
UNMIH	HTI	1996	18	3.5	1995	0.105588 9
UNSMIH	HTI	1996	18	3.5	1995	9
UNSMIH	HTI	1997	18	3.5	1996	0.179487 10
UNTMIH	HTI	1997	18	3.5	1996	10

資料來源：UNDPO(2021)、World Bank(2021)、Marshall & Gurr(2020)、Marshall & Elzinga-Marshall(2018)、Perry & Smith(2018)。

針對海地民主化的成功案例，本文作者認為「國際因素—存在美國、美洲國家組織」等第三方行為者是重要關鍵。1993 年 UNMIH 介入海地政變後，1994 年 9 月 19 日美軍亦領導具軍事干預性質的「民主行動」(Operation Uphold Democracy)，欲於海地植入民主政治。

1993 年 1 月，美國前國務卿華倫·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於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致詞：幫助拉丁美洲鞏固十年來得之不易的民主進程，符合美國的自身利益。<sup>31</sup>

因此，1994 年 5 月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宣布：維護美國國土安全的方法，是幫助擴大全球的民主社群，使世界大國實踐民主計劃。<sup>32</sup>

Hippel(1995)指出促進民主是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的重點外交政策，並由美國國際開發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以下簡稱 USAID)執行。美國對任務駐在國內政直接促進民主形式包括加強法治、提倡人權、改善財務管理、促進權力下放、擴張文人對武裝力量的控制(expand

31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3.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Bureau Democratic Initiatives Program." <https://www.usaid.gov> (Accessed on April 28, 2021)。

32 CNN telecast. 1994. "Global Forum with President Clinton." <https://clintonwhitehouse6.archives.gov/1994/05/1994-05-03-cnn-telecast-of-a-global-forum-with-president-clinton.html> (Accessed on April 28, 2021)。



civilian control of the armed force)等。也有與當地利益團體合作，針對選舉過程、立法機關、政黨、媒體等面向進行教育。對駐在國內政間接促進民主形式包括施加經濟壓力、暫停提供援助，及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貸款提案中使用否決權或棄權。藉由上述手段，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民主運動獲得明顯的成功，各國在外界的壓力與干預下主動進行改革。

1991年海地政變後 Aristide 總統被迫逃往海外，海地公民社群發起 Lavalas 運動(Fanmi Lavalas)。根據 Revista Envío(1997)的報導，Lavalas 運動旨在抵抗 Raoul Cédras 的極權政府(Front for the Advancement and Progress of Haiti，以下簡稱 FRAPH)及其衍生的軍事派系鬥爭(military-Macoutist derivatives)問題。運動訴求主軸為重返民主、增強以愛國為名的反抗精神(patriotic resistance)並促成基層團結(grassroots unity)。<sup>33</sup>Costello(1995)向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以下簡稱 UNHCR)的報告中指出，由於國際社會未能凝聚制裁 FRAPH 的共識並採取行動，使軍政府對民眾的迫害變本加厲。包含對前總統 Jean-Bertrand Aristide、前太子港市長 Evans Paul 支持者的任意逮捕，非法拘留和實施酷刑、公開處決民權領袖 Antoine Izméry、槍殺前司法部長 Guy Malary。海地民眾在派遣團介入前的言論自由權也遭剝奪，分發手冊、張貼海報都會受到 FRAPH 逮捕。既有的農業合作社、基層教會組織、社區團體、獨立媒體、工會、學生團體和婦女團體集會結社權也遭限縮，組織並參與示威遊行的申請門檻過高，以至於根本無法合法舉辦街頭運動。根據 WRITENET(1995)的記錄，1995年1月31日至5月31日間太子港市就發生296起謀殺案、91起強迫失蹤案和66起性侵案。<sup>34</sup>

因此，國際社會透過維持和平行動(UNMIH、UNSMIH、UNTMIH)與由聯合國授權美國、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以下簡稱 OAS)主導的多國部隊介入海地政變，「確保海地政府尊重人權，從而提供政治解決方案，以便創造恢復海地民主憲政的政治環境(help ensure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33 <https://www.envio.org.ni/articulo/2053> (Accessed on April 28, 2021)。

34 WRITENET 是由 UNHCR 委託執行研究的智庫，其發表內容包含人權、移民、種族和政治衝突等。 <https://www.refworld.org/country,,WRITENET,,HTI,,3ae6a6c30,0.html> (Accessed on April 28, 2021)。

thereby creating a suitable climate in which a political solution for the restoration of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Haiti could be achieved)」(IACHR 1997, para 155)。<sup>35</sup>隨後前總統 Aristide 和 FRAPH 領袖 Raoul Cédras 於 1993 年 3 月 7 日在美國紐約市曼哈頓區總督島上簽署《總督島協定》(Accord de Governors Island)，Aristide 順利於 1993 年 10 月 30 日返國。<sup>36</sup>該協定包括要求海地政府任命新總理、頒布大赦並對 Raoul Cédras 作後續安排、終止經濟制裁及建立新警政體系以區隔警力與軍力等內容。

駐海地維和行動成功的另一原因，要歸功於美軍領導下多國部隊的強大武力。部隊透過定期巡邏，確保都市及鄉村各地區平民的安穩生活。拘留、裁撤軍事組織人員(paramilitaries)，扣押武器與槍枝以消弭暴力行為。同時，協助建立國內警政與刑事司法體制，對政變期間涉嫌侵犯人權者進行蒐證、事實查核並實踐司法正義。<sup>37</sup>「1994 年由 USAID 執行的民主行動十分成功，國際社會已解除對海地的各項物資禁運，並持續提供糧食援助。Aristide 回國後，拘留在美軍駐古巴關塔那摩灣拘押中心(Guantanamo Bay)的 14,000 名海地難民亦已順利返國。1995 年初 UNMIH 接手民主行動(Operation Uphold Democracy)，直至 1996 年 2 月新任海地總統 René Préval 就職」(Hippel 1995, 13)。

接著討論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以下簡稱 OAS)人權委員會(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以下簡稱 IACHR)在難民救助議題扮演關鍵角色。<sup>38</sup>有賴於 IACHR 的積極介入，海地境內局勢方能迅速穩定。極右軍政府 FRAPH 政變民選總統 Aristide 後使海地陷入政治暴力循環，迫使大批政治難民試圖非法入境美國。1992 年 2 月 6 日 IACHR 提出美洲國家組織緊急申請行動(Emergency Application for Provisional OAS Action)，要求美國政府遵守難民不遣返原則(Principle of Non-Refoulement)，提供庇護予軍事政變下受

---

35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1997. "Report on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Haiti- Chapter III: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Haiti." <http://www.cidh.org/countryrep/EnHa94/eh94c3.htm> (Accessed on April 28, 2021).

36 <https://peacemaker.un.org/haiti-governors-island93>(Accessed on April 28, 2021)。

37 但 Costello(1995)也經由聯合國海地問題特別觀察員(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Haiti)Bruni Celli 博士於 1994 年向大會提交之報告中指出，缺乏培訓、低薪的海地法官及司法單位導致腐敗情事。維持治安的警察只能在太子港(Port-au-Prince)和海地角(Cap Haitien)兩個主要城市看見，且事實上這些執法人員仍屬於武裝部隊，國家尚未能建立起警官培訓制度。

38 IACHR. 1997. "The Haiti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et al. v. United States, Case 10.675." <https://www.refworld.org/cases,IACHR,3ae6b71b8.html> (Accessed on May 3, 2021)。

迫的海地公民。同時，IACHR 也要求國際社會盡快深入調查、評估海地境內政治暴力的程度，並要求國際社會應具備能力向難民提供救濟(the ability of third-party countrie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Haitians forcibly repatriated)。如第一節所述，美軍迅速於 1994 年 9 月 19 日組建多國部隊執行「民主行動」(Operation Uphold Democracy)，OAS 的影響力功不可沒。海地日後能經由維持和平行動逐步恢復民主政治，若缺少 IACHR 在 1992 年對政變的關注與訴求，情勢恐大相徑庭。

表 4.3 以國際與國內層次作任務成效衡量指標

編號	指標
國際層次—區域型國際組織與第三方行為者	
1	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展現一致決心支持解決海地內戰，促使交戰雙方於 1993 年 UNMIH 介入後即達成最終和平協議。
2	區域組織如 OAS 的外交努力，與美國領軍的民主行動扮演重要角色。
國內層次—任務駐在國中央政府與叛軍關係	
3	叛軍組織 FRAPH 領袖 Raoul Cédras 配合維和行動後續安排。
4	總統 Jean-Bertrand Aristide 和叛軍領袖 Raoul Cédras 簽署《總督島協定》(Accord de Governors Island)，以非暴力形式(non-violent means)解決衝突使海地迅速恢復和平。

資料來源：Pushkina(2004)、Heldt & Wallensteen (2005)、Tardy (2015)。

說明：根據上述學者評估維持和平任務成功與否時，述及的各項指標所改良之表格。

本文選擇的第二個成功案例，是自 1995 年介入克羅埃西亞的聯合國克羅埃西亞恢復信任行動(United Nations Confidence Restoration Operation)與至 2002 年撤出的聯合國普雷夫拉卡觀察團(United Nations Mission of Observers in Prevlaka)。根據 Polity V 的民主評分，經維和行動介入的克羅埃西亞從 6 分提高至 19 分，共計有正分 13 分的民主得分。

表 4.4 於克羅埃西亞執行之維持和平行動

任務名稱	年代	民主得分變化
聯合國克羅埃西亞恢復信任行動 (United Nations Confidence Restoration Operation, 以下簡稱 UNCRO)、 <sup>39</sup> 聯合國普雷夫拉卡觀察團 (United Nations Mission of Observers in Prevlaka, 以下簡稱 UNMOP)	1995 年至 2002 年	+13

資料來源：UNDPO(2021)、Marshall & Gurr(2020)。

首先根據表 4.5 變數數據，克羅埃西亞在國際社會介入南斯拉夫內戰前的 Polity V 民主得分為 6 分。1995 年 UNCRO 涉入後鼓勵交戰雙方簽署停火協議。隔年 UNCRO 撤出改為完全由文職人員組成的 UNMOP 接替。隨後克羅埃西內政情況大幅改善，Polity V 得分於 1999 年增至 12 分。在此個案中，Perry & Smith(2018)的軍文比例數據，與本文研究假設相符。自 1996 年 UNMOP 接替以來，軍文比例與民主得分呈現正相關，海地民主得分於 2002 年提高至 19 分。

再者，根據 Marshall & Elzinga-Marshall(2018)的脆弱指標，數據呈現結果亦與研究假設相符。1996 年 UNMOP 接替 UNCRO 後，克羅埃西亞脆弱程度穩定改善，治理表現由 16 分增高至 22 分，民主得分亦隨之提高。

39 根據加拿大國家安全與防禦網站(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se)(2018)克羅埃西亞政府於 1995 年 3 月宣布將不再同意延長聯合國保護部隊(United Nations Protection Force, 以下簡稱 UNPROFOR)任務期限。於是 UNPROFOR 改組為三個個別的維持和平行動，其中安理會於 1995 年 3 月 31 日依據第 981 決議成立 UNCRO，旨在監測 UNPROFOR 原部署區域、確認克國境內軍事武器(weapons systems)符合和平協議規定、維持過境檢查站職能等。UNCRO 的任務授權還包括聯合國保護區(UN Protected Areas)去武裝化、協助建立常態民選政權(normal civil authority)、監控 Krajina 地區過境點。



表 4. 5UNCRO 與 UNMOP 變數統計表

任務名稱	國家代號	任務年份	Polity V	自由之家	軍文比例	脆弱程度	碎裂程度	
UNCRO	HRV	1995	6	4	1994		4	
UNCRO	HRV	1996	6	4	1995	0.058976	16	3
UNMOP	HRV	1996	6	4	1995		16	3
UNMOP	HRV	1997	6	4	1996	1	18	2
UNMOP	HRV	1998	6	4	1997	1	19	2
UNMOP	HRV	1999	12	4	1998	1	19	2
UNMOP	HRV	2000	19	5.5	1999	1	19	3
UNMOP	HRV	2001	19	6	2000	1	21	3
UNMOP	HRV	2002	19	6	2001	1	22	3

資料來源：UNDPO(2021)、World Bank(2021)、Marshall & Gurr(2020)、Marshall & Elzinga-Marshall(2018)、Perry & Smith(2018)、Cunningham et al.(2020)。

本文作者認為海地的民主表現迅速好轉，肇因於維和行動整合境內分裂的民兵組織，恢復實施海地民主程序，「國際因素」的影響力較明顯。對比於海地個案中國際社會的介入與大國領導，克羅埃西亞能成功民主轉型，不僅「國際因素」充足，本身的「國內因素」不容忽視。

1991 年 4 月 25 日克羅埃西亞自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宣布獨立。Freedom House(2021)認為 1991 年至 1995 年間克羅埃西亞前總統 Franjo Tudjman 及前執政黨民主聯盟黨(Croatian Democratic Union Party, Hrvatska Demokratska Zajednica)，透過官方媒體散播民族主義思想，藉以鞏固政權。因此克羅埃西亞在自由度評比中，政治權力與公民自由的平均得分僅有四分，屬於部分自由的國家。

首先應知曉第三方行為者在克羅埃西亞的民主進程中佔有要角。南斯拉夫內戰期間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以下簡稱 EC)<sup>40</sup>於 1991 年派遣歐洲共同體觀察任務(European Community Monitoring Mission)，負責執行針對南斯拉夫的武器禁運、終止經濟援助等制裁。EC 也成立南斯拉夫和平會議仲裁委員會(Arbitration Commission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on Yugoslavia)，針對南斯拉夫解體提供法律意見，有助於日後波士尼亞、賽爾維亞、克羅埃西亞等國的獨立建國。

接著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組建 UNCRO 並於 1995 年涉入，協助克國政府與塞爾維亞前總統 Slobodan Milošević 針對西斯洛沃尼亞和克拉伊納地區(Western

40 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成員國於 1993 年簽署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後，將區域國際組織更名為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Slavonia and the Krajina region)談和，雙方於1995年11月12日簽署《關於東斯洛沃尼亞，巴拉尼亞和西塞爾曼地區的基本協定》(Basic Agreement on the Region of Eastern Slavonia, Baranja and Western Sirmium)。<sup>41</sup>隨後南斯拉夫部隊從該地撤出，並與克羅埃西亞建立外交關係。

1996年1月15日聯合國安理會依據第1037決議終止UNCRO，並由聯合國東斯洛沃尼亞過渡行政當局(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al Administration for Eastern Slavonia，以下簡稱UNTAES)接手東斯洛沃尼亞的維和工作。同時再依據第1038決議成立UNMOP接替UNCRO在克羅埃西亞境內的未完任務。1999年12月Franjo Tudjman去世，克國威權政治情況逐步改善。2000年1月克國舉辦總統大選，Stjepan Mesic勝出並任命Ivica Racan擔任總理，領導由克羅埃西亞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Croatia, Socijal demokratska partija Hrvatske, SDP)、克羅埃西亞農民黨(Croatian Peasant Party)、克羅埃西亞人民黨(the Croatian People's Party)、克羅埃西亞自由黨(the Croatian People's Party)和伊斯特拉民主議會(Istrian Democratic Assembly)組合而成的中間偏左聯合政府。克羅埃西亞的民主政治，經過自由公正的選舉後鞏固成形。

2002年UNMOP撤出普雷夫拉卡(Prelavka)半島，克國政府實際掌控境內所有領土，並定期舉行總統和國會選舉。2013年克羅埃西亞成為歐洲聯盟會員，配合歐盟成員規範(European Union membership rules)推進民主程序(democratic procedures)。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2021)也認為，2000年後克羅埃西亞建立穩定、多元的政治體制；政黨輪替被實踐、憲政秩序保障所有公民不分種族的基本人權、政府業已建立調查和檢察機構(investigative and prosecutorial body)打擊大規模的政治腐敗情事，屆時克國公民政治環境大體完備。Pushkina(2004)也認為克羅埃西亞政府建國歷程中，逐步改善立法程序、調整公民參政年齡限制、擴充選民母體，且和平整併內戰造成的地區分裂(re-incorporation of Serb-held areas)，並以立法方式保障塞族裔的政治特權(political enfranchisement)，這些都是民主化萌芽的基石。

Ivan, Romea and Petra(2016)提出另一觀點，認為克國民主化源自實驗型的地方自治政府(self-government)。尚未自南斯拉夫獨立前，克羅埃西亞便嘗試在經濟

---

41 <https://peacemaker.un.org/croatia-erdutagreement95> (Accessed on April 28, 2021)。

活動、公共服務、地方治理和政治制度等面向實行自我管理。而「自我管理的概念，來自於工人參與工廠決策的工業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工人成立自治委員會(self-managing interest councils)，在計劃經濟下逐步創立市場規則，帶動社會經濟與民主概念的蓬勃發展」(Ivan, Romea & Petra 2016, 2-3)。「自社會主義聯邦脫離時，克羅埃西亞由 102 個單型公社(monotypic communes)組成，公社具有財政自主決策權，並在 1990 年後與中央政府產生衝突。<sup>42</sup>內部衝突導致地方政府改革延宕，直至 1993 年《地方自治和行政法》生效方消弭，上述的單型公社也轉制成 556 個二級地方政府」(Ivan, Romea & Petra 2016, 7-8)。有賴於 2000 年憲法修正案的通過，中央立法機構因而確立。中央與地方政府也在 2001 年地方制度法修正案後實踐行政分權。「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是克國得以成功揚棄民族主義政治的先決條件(prerequisite)，縣政府在教育、衛生、社會福利和消防上掌握更大管轄權」(Ivan, Romea & Petra 2016, 8)，並在 2009 年舉行第一場縣市首長選舉。根據克羅埃西亞公共行政部(Minist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的資料，1993 年至 2012 年間公民投票(referendum)、公民提案(citizens' initiative)、籌辦諮詢會議(consultative meetings)、複決流程(recall procedure)也依序落實。公民參與、地方治理作為轉動克羅埃西亞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機制的齒輪，使克國社會民主化大功告成。

---

42 Ivan, Romea and Petra(2016)克羅埃西亞的議會原是由工人議院(workers' chamber)、地區社群議院(territorial communities' chamber)和社會政治議院(social-political chamber)組成的三院制議會(tricameral assemblies)，改革成一院制後在1990年5月舉行首次多黨參選的國會選舉。

表 4.6 以國際與國內層次作任務成效衡量指標

編號	指標
國際層次—區域型國際組織與第三方行為者	
1	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一致支持終止南斯拉夫內戰，UNCRO 於 1995 年涉入後促成克羅埃西亞總統 Franjo Tudjman 與塞爾維亞總統 Slobodan Milošević 簽署《關於東斯洛沃尼亞，巴拉尼亞和西塞爾曼地區的基本協定》。
2	1991 年 EC 派遣「歐洲共同體觀察任務」執行武器禁運，並成立「南斯拉夫和平會議仲裁委員會」協助內戰各方和平解決國際爭端。
國內層次—任務駐在國中央政府與叛軍關係	
3	克羅埃西亞總統 Franjo Tudjman 與塞爾維亞總統 Slobodan Milošević 主動配合維和行動後續安排，並於 1995 年建立外交關係。
4	衝突以非暴力形式(non-violent means)解決後，國家恢復穩定並持續發展民主政治。如於 2000 年舉辦總統大選、2001 年國會推動地方制度法修正案、2009 年舉行第一場縣市首長選舉。

資料來源：Pushkina(2004)、Heldt & Wallensteen (2005)、Tardy (2015)。

說明：根據上述學者評估維持和平任務成功與否時，述及的各項指標所改良之表格。

## 第二節 失敗案例

本節將接續討論維持和平行動的失敗案例。1993 至 1997 年間有賴維持和平行動的涉入，海地民主得分顯著提高。爾後在 René Préval 總統要求下，安全理事會一致決議通過第 1141 號決議，於 1997 年派遣聯合國海地民警特派團(The United Nations Civilian Police Mission in Haiti)接替 UNTMIH，協助訓練海地國家警察(Haitian National Police, HNP)，欲培養專業清廉、規模和結構適當、能迅速履行各項職能的國家警政體系，以鞏固民主並振興司法體系。<sup>43</sup>然而，海地的內政情況與決議宗旨大相逕庭，2000 年 Polity V 對海地的民主評分由 18 分降至 9 分。

43 <https://peacekeeping.un.org/sites/default/files/past/miponuh.htm>(Accessed on May 4, 2021)。

表 4.7 於海地執行之維持和平行動

任務名稱	年代	民主得分變化
聯合國海地民警特派團 (The United Nations Civilian Police Mission in Haiti, 以下簡稱 MIPONUH) <sup>44</sup>	1997 年至 2000 年	-9

資料來源：UNDPO(2021)、Marshall & Gurr(2020)。

首先根據表 4.8 變數數據，海地在 MIPONUH 介入前的 Polity V 民主得分為 18 分。在此個案中，Perry & Smith(2018)的軍文比例數據與本文研究假設不符。自 1997 年由文職人員組成的 MIPONUH 負責訓練 HNP 以來，軍文比例與民主得分呈現負相關。本文推斷在警政、司法體系不成熟的海地國內，不具武力授權的維和行動恐無力於制暴。

表 4.8 MIPONUH 變數統計表

任務名稱	國家	任務年份	Polity V	自由之家	軍文比例	脆弱程度
MIPONUH	HTI	1997	18	3.5	1996	10
MIPONUH	HTI	1998	18	3	1997	11
MIPONUH	HTI	1999	14	3	1998	10
MIPONUH	HTI	2000	9	2.5	1999	0.999703 13

資料來源：UNDPO(2021)、World Bank(2021)、Marshall & Gurr(2020)、Marshall & Elzinga-Marshall(2018)、Perry & Smith(2018)。

聯合國和平行動部副秘書長 Jean-Pierre Lacroix(2020)認為：

維和行動提供孕育民主政治的環境與溫床，促使民主進程在世界各地紮根，但諸多政治解方仍待國際社會共同商議。<sup>45</sup>

由於 1997 年的海地已不適用前述的國際、國內層次分析。國內不存在明顯的叛亂團體，亦未有區域型國際組織與第三方行為者提供外援。故欲瞭解海地的內政情況發展，本文欲從脆弱程度與治理表現著手分析。雖 René Préval 領導下的民選政府具備政權合法性，但中央機關能否建立完備治理機制、保障公民參與

44 在邱稔壤(2012)研究中，海地總統 René Préval 在 UNTMIH 任務結束之際，於 1997 年 10 月 29 日致函聯合國秘書長，請聯合國針對海地警力建構持續提供協助。1997 年 11 月 28 日安理會依據第 1141 號決議派遣 MIPONUH，該特派團非屬軍事性任務，由 300 名民警人員組成。主要目的在強化海地國家警察的專業化能力，並以訓練特種警察部隊為主。

45 <http://webtv.un.org/watch/jean-pierre-lacroix-dpko-on-maintenance-of-international-peace-and-security-security-council-open-rtc/6189242630001>(Accessed on May 4, 2021)。



政治的途徑等因素，亦是影響維和行動任務成效的要件。本文作者認為政府治理能力拙劣、未能落實民主政治內涵，是 MIPONU 無力協助駐在國民主化的主因。

Diamond & Leonardo (2004)建議評估政府是否具備高度民主素養時，可以參考「法治、參與、競爭，縱向問責制、橫向問責制、尊重公民自由、保障政治自由和回應能力」(Diamond & Leonardo 2004, 22)。程序性的法治、參與、競爭和問責制，建立了社會運作的規則，並讓公民在服從、實踐時有跡可循。實質性的尊重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使國家逐步實現社會和經濟平等。最後透過政府的回應能力衡量公共政策，是否符合公民的需求和偏好，從而將程序性民主與實質性民主揉雜搏和。「在民主政體中，自由、公正、具決定性、制度化的選舉(free, fair, decisive and institutionalized elections)是政權更替的方式，不適任的民選官員能透過機制罷免，公民有權要求政治人物對社會議題負責」(Vargas Cullell 2012, 7)。透過民主程序所得之政府，應能保障公民自由、政治權利、不應箝制公民參與政策制定或逾越法治。因此，當中央政府無法建立一個能使公民「有意義地參與政治」的環境，則該國的民主表現將停滯不前。

回到個案海地，Shamsie(2019)不以定期選舉、政黨輪替等體制因素來評估民主進程，而從中央政府與公民社會的互動，檢視海地境內民主政治發展遲緩的原因。「民主發展的關鍵，是改變國家制定和執行決策的方式，並在此過程中賦予公民參與公權力的角色。當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機會越多，監督政府施政的民主質量越高」(Shamsie 2019, 35)。<sup>46</sup>但海地發展民主政治的路徑相當艱困，Trouillot (1994)認為從海地獨立史中可見，不平等、階級分化和暴力衝突已內化成海地內政的必然特徵。「海地政府的威權傳統限制公民參與，將絕大多數國人排除在政治參與之外，領導人的國家政策又受制於白人至上秩序(white supremacist order)和世界資本經濟(world capitalist economy)」(Shamsie 2019, 38)。國際社會透過官方援助計劃、建設和平行動和外交干預(extensive aid programs, peace-building

---

46 Shamsie(2019)針對 Michel Martelly 政府自 2010 年海地地震事件後，發展的土地開發政策 Caracol 工業園區(Caracol Industrial Park)為例，分析海地農民與政府間地政衝突導致的民主問題。儘管有別於本文研究時代 1997 年至 2000 年間的海地民主狀況，但倘若讀者對地籍登記、土地徵收與重劃、環境保護與開發如何影響民主發展歷程有興趣，作者建議閱讀 Shamsie(2019)的文章。另一方面，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記者 Walter(2017)也指出，中央政府未能解決國內農地使用問題，單一作物的耕種方式導致土壤枯竭、糧食危機嚴峻，導致海地多數人口生存在貧窮線邊緣。



operations, and diplomatic interventions)建立起的民主政治，都只能加強政黨政治、民主選舉等部分民主結構，而無益於鞏固 Robert(2004)、Diamond & Leonardo (2004)、Vargas Cullell (2012)、Shamsie(2019)定義的民主內涵。

與此同時，海地國內司法制度效能不彰、海地國家警察羸弱，故國內竊盜、毒品販運等罪行猖獗。警政體系偵辦刑事案件的流程，也因法院未能發揮功能作出判決而受阻。整體而言，1997 年的 MIPONUH、2004 年聯合國海地穩定特派團(United Nations Stabilization Mission in Haiti)及 2017 年聯合國海地司法支助特派團(United Nations Mission for Justice Support in Haiti )等駐海地維持和平行動，也因執行任務時缺乏與上述政府部門協調，導致海地民主政治環境發展緩慢。<sup>47</sup> 直至當代 2021 年，海地境內的警政與司法體系仍乏善可陳。根據路透社(Reuters)記者 Andres(2019)的報導，海地公務機關腐敗行事、經濟市場嚴峻，缺乏糧食、醫療與教育資源的海地至今仍是美洲地區最貧窮國家。<sup>48</sup>



---

47 Andres Martinez Casares. 2019. "U.N. peacekeeping mission to Haiti ends after 15 years with mixed legacy."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aiti-politics-idUSKBN1WU2SP> (Accessed on April 09, 2021)。

48 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自 1995 年為世界各國的貪污腐敗程度進行評分，最近期更新研究為 2020 年清廉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國際透明組織自 2012 年開始對海地貪腐程度進行評分，海地在滿分 100 分中獲得 19 分。根據 2020 年的清廉印象指數，海地降至 18 分，在 180 個國家中排名 170 名。由此可見，海地的貪腐程度並未隨維和行動介入而有所改善。<https://www.transparency.org/en/cpi/2020/index/nzl> (Accessed on May 4, 2021)。

## 第五章 結論

本文透過量化與質性並重的方式，分析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與駐在國民主化的關聯，研究發現臚列於下。

儘管聯合國和平行動部(UNDPO)並未明說，然依據本文作者觀察，協助組建具備民意基礎的政府，是當代維和任務的重要環節。唯有落實政黨輪替、保障完善公民參政權及立法—司法—行政部門的分責，才是開啟民主的敲門磚。而通向民主之路需有三個步驟，首先，作者認為維和行動必須確實依據任務授權發揮穩定情勢的功能，方有可能進一步帶動駐在國國家政體的改革。再者，國際社會對於該情勢的持續關注與支持，包括區域大國與區域型國際組織的協作，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任務的成效。最終，當駐在國政府執政機制持續運轉，國家選舉常態化方能逐步實踐，進而建立制度化的國家紀律和政府化的治理模式。

在文獻回顧章節中，本文引述 Doyle & Nicholas(2000)的觀點，指出授權多邊執法行動是國際社會協助失序國家恢復和平穩定的重要手段。透過培植駐在國改革能力、協助調解叛亂團體與政府間的內政衝突，維和行動可以終止暴力、促成國家民主化。然而作者也認知到，這些地區通常內政情況複雜、衝突類型迥異。儘管聯合國承諾實踐永續和平，但若想在終止衝突、保障人權後建立民主政體，需要時間與政府意願等諸多條件的配合(Fortna, 2003; 2004; 2008)。Jarstad(2008)也提出各個任務駐在國政府改革能力的差異，會反映在爾後政黨權力分配、公民自由下放等議題上，民主化需仰賴國家意識此態度和行為的轉變方可達成。參考Diamond & Leonardo (2004)、Vargas Cullell (2012)與 Shamsie(2019)對民主素養的見解，作者認為若想透過維和行動促進國際社會的民主進程，調整任務授權是重中之重。協助任務駐在國達成程序性民主—舉辦透明合法的選舉，無法解決內戰國家盤根錯節的內政問題；唯有向任務駐在國提倡民主實質內涵—如維護司法體系、賦權公民參與及地方治理，才能締造一個法治、自由的民主國家。

###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文於第二章第三節發展兩種研究理論。在量化分析中，本文使用一般最小平方模型，以「軍文比例」、「碎裂程度」、「脆弱程度」三種變項，作與自變項「駐在國民主化」具備顯著正向相關的研究假設。

首先，作者建立 42 項維持和平行動與任務駐在國民主化的通則性解釋時，本文否認 H1、H2 兩項研究假設，駐在國民主化與軍文比例、碎裂程度兩個變項，不存在顯著關聯。同時，本文發現脆弱程度與駐在國民主化具有統計結果上的顯著相關性，因此驗證本文的 H3 研究假設。

針對第一項研究假設，作者參考 Mattes & Savun(2010)、Mironova & Whitt(2017)對「派遣團成員性質差異」與「維和行動任務成效」的見解，提出當任務授權從終止衝突晉升為建構和平，文職成員比例較高的派遣團，較能促成內戰國家政府革新，因此民主得分會隨之提高。然而經過實證研究，作者否認了自己的假設，駐在國的民主表現與派遣團成員性質沒有明顯關聯。針對第二項研究假設，作者認同 Mironova & Whitt(2017)、Art & Theodora-Ismene (2020)、Albrecht(2020)的觀點，相信維和行動能促進交戰雙方協調溝通、制裁破壞協議者並黏合碎裂的國內社會。當衝突的持續時間縮短、暴力程度降低，駐在國民主表現就會改善。但本文在統計分析上遇到兩項掣肘：一為個案數額的稀缺；二為年代久遠導致變項數值遺漏。故本文在驗證駐在國碎裂程度與民主化關聯性時，未能取得顯著的統計結果。

表 5.1 量化分析對照表

研究假設	統計數值	結果
H1 當派遣團成員軍文比例中文職愈高，駐在國受介入後民主化程度愈高。	自變數的 $\beta$ 值為-0.243，軍文比例與民主得分呈現負相關。意即當派遣團成員中文職比例越高，駐在國民主得分會降低，但此統計結果不具顯著性，	研究假設為誤。
H2 當任務駐在國碎裂程度越低，駐在國受介入後民主化程度愈高。	自變數的 $\beta$ 值為-0.255，碎裂程度與民主得分呈現負相關。意即當碎裂程度降低，駐在國民主表現未有隨之改善，但此統計結果不具顯著性。	研究假設為誤。
H3 當任務駐在國脆弱程度越低，駐在國受介入後民主化程度愈高。	自變數的 $\beta$ 值為 0.657，計分方式轉制後的脆弱程度與民主得分呈現正相關。當脆弱程度降低，駐在國民主得分會隨之提高。且 p 值為 0.000，統計結果具備顯著性。	研究假設為真。

資料來源：UNDPO(2021)、World Bank(2021)、Marshall & Gurr(2020)、Freedom House(2021)、Cunningham et al.(2020)、Perry & Smith(2018)、Marshall & Elzinga-Marshall(2018)。

作者知悉量化研究成果後，為細究影響維和行動與任務駐在國民主化關聯的要件，將焦點轉至海地與克羅埃西亞兩國。在個案分析中，本文以「國際層次—區域型國際組織與第三方行為者」及「國內層次—中央政府與叛軍關係」兩層次，揭櫫維和行動(UNMIH、UNSMIH、UNTMIH、MIPONUH、UNCRO、UNMOP)與海地及克羅埃西亞民主化的歷史脈絡。

克羅埃西亞與海地皆於1990年初發展民主化，前者遭南斯拉夫內戰蹂躪後，經過談判程序重掌西斯洛沃尼亞和克拉伊納地區，方真正獨立；後者能迅速鎮壓國內政變、簽署《總督島協定》，則是肇因於美國以門羅主義為首的外交政策。

介入海地的 UNMIH、UNSMIH、UNTMIH，與維序克羅埃西亞的 UNCRO、UNMOP，此些維和行動皆使兩國在民主得分上有正分改變。本文從國際層次解讀影響任務成效的要件，指出國際社會挹注資源功不可沒。海地政變有區域型國際組織 OAS 的倡議與 USAID 領軍的民主行動(Operation Uphold Democracy)，克羅埃西亞獨立歷程則是能看見歐洲共同體觀察任務(European Community Monitoring Mission)及南斯拉夫和平會議仲裁委員會的身影。

然作者發現帶動國家民主轉型的關鍵要素，仍屬外交領域、國際關係層次無從干涉的國內政治。國際因素的效用將被國內因素消弭，如國會一黨獨大、行政效能低落、司法與警政部門貪腐等問題，都拖累了駐在國的民主得分。舉兩例來說，儘管聯合國能促使克羅埃西亞境內軍事組織去武裝化，但國內仍一黨獨大——Franjo Tudjman 總統及其所屬民主聯盟黨，直至 UNMOP 接替 UNCRO，克羅埃西亞才在 2000 年 1 月重新舉辦總統選舉；而海地國內政治情事更為嚴峻：行政、立法部門彼此攻訐傾軋，中央政府治理能力孱弱。重塑司法、警政系統需要長時間耕耘，良莠淆雜的法官與警官，幾乎無從自主維護海地的社會秩序。故儘管 MIPONUH 涉入訓練 HNP，海地民主政治卻巨幅倒退。

質言之，民主化的終止或延宕，無法歸咎於單一變數，也不意謂著國家條件的失格。當代社會中的主權獨立國家，仍由民主共和、威權獨裁、君主立憲等不同形態的政體組成。在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中，使國家民主化並非目的，而是作為穩定國家情勢的常用手段。民主政治的確無法解決所有現存的國際議題，一味追求民主程序、視民選政府為終止內戰的主臬，恐陷入更混亂動盪的桎梏中。因此，如何在政府權威與公民團體自治中取得折衝是關鍵。本文相信透過「國際社會的呼籲」與「公民參政的促進」，可以削弱獨裁政權對社會發展的宰制，從而協助國家自主決定未來走向，藉此增強國際安全。

## 第二節 研究建議

首先，作者建議針對任務授權(mandate)差異性做評估、分類。當維和派遣團實際能發揮的角色無法與駐在國當地需求吻合，那維持和平都是有困難的，遑論促進民主化。如 1997 年至 2000 年間，海地需要發展司法與警政體系。然而 MIPONUH 除了提供海地國家警察培訓課程，未有針對整治司法部門的任務授權，因此國內司法—行政部門效能低落、形同虛設。如本文第一章第四節研究限制所



述，維和行動的任務授權必然影響到往後的執行成效。若能針對包含及不包含「促使駐在國民主化」性質的「維和行動授權」進行比較研究，相信會具備更精準的解釋力。

再者，針對維和行動與國家政權碎裂程度的研究，本文使用叛亂團體的數量來衡量社會分裂的情況。但這種操作方式無從知曉叛亂團體間各自的差異。因此，本文建議進行個案研究時，整理任務駐在國中各叛亂團體的起源與訴求，相信有助於釐清碎裂程度對維和行動成效造成的阻礙為何。

最後，本文作者將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關聯性於此陳述。康德於 1795 年出版《論永久和平》和平三支柱中，包含共和代議制、和平聯邦與經濟互賴。有關於共和代議制與和平聯邦如何帶來國際社會的和平穩定，本文分別以民主政體及區域型國際組織的介入論述之。而第三種由經濟維繫和平，進而促進民主轉型是本文未觸碰到的範疇。

進一步言之，有學者細究「參與維和行動」及「派遣國與駐在國的貿易互動」兩者的關係。Stojek & Tir(2015)認為，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而不選擇獨自介入，能降低第三方行為者干預內戰或衝突時的經濟成本，並確保自身在主導國際事務上的優勢。舉例來說，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與內戰國家之間的貿易關係，乃是影響「是否批准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UNDPO 如何分配資源？」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在解讀一項維和行動的決議內容或授權性質時，五大國的經濟利益可以視作指標。

「從世界體系理論的角度來看，將過剩的工業產品賣給半核心、邊陲國家，並向其進口初級商品與天然資源，是核心國家宰制國際勞動分工的主要手段。為了維護國際貿易過程的穩定和平，聯合國派遣維和行動可能隱藏經濟動機，且旨在維護國際資本主義制度。」(Stojek & Tir 2015, 370-371)。由於國際社會中國家間經濟相互依存，維持重要貿易夥伴國內的穩定性變得至關重要。因此區域大國或國際強權，才需要透過支持、參與維和行動，來恢復內戰國家的穩定和平。換句話說，當人道主義結合國際市場利益，國際社會將預見更多的貿易與維和行動。

49

---

49 但 Stojek & Tir(2015)也同意經濟利益並不總是第三方行為者參與維和行動、干預內戰衝突時的首要考量。以索馬利亞、波士尼亞和海地等國的維和行動為例，人道主義和戰略因素的重要性便大於經濟利益。

欲進行經濟表現與民主化的一致性觀察，作者建議使用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經商自由度(Doing Business)評分，進行經濟發展帶動民主轉型的討論。<sup>50</sup>而針對本文個案海地與克羅埃西亞，Fatton(2004)認為由於海地未能發展富饒經濟生活，導致國人無法建立公民意識(citizenship)。「海地社會不存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the bourgeoisie and working class)的差異，由於能孕育權力爭奪的階級差距不存在，公民意識因而消弭，海地境內的極權專制方長久不衰。每一位公民都活在社會底層(subordinate classes)，在溫飽的不確定下與政治脫節，使國家民主化遙遙無期」(Fatton 2004, 218)。Shamsie (2019)也針對海地於2010年後發展的Caracol工業園區計畫，討論經濟自由化與民主進程的關聯。全球化下的經濟鏈接和符合資本市場導向的國家政策，是否有改善民主前景的可能性值得吾輩深思。「對於欲在國際社會促進民主化的強權聯盟(powerful coalitions of forces)而言，達成政治穩定、保持現行的經濟和社會秩序，才是他們的最終目的，而民主僅是完成此目標的手段」(Shamsie 2019, 38)。

許多當代符合民主政權定義的國家，是否確實保障經濟層面的公民自由，也會影響到民主化的深度與廣度。維和行動派遣團在內政情勢穩定後，是否就經濟層面給予駐在國指導：舉凡個人與企業財產權的課稅比例、打擊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等，都是可以觀察的面向。希冀上述建議有助於「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與「任務駐在國民主化」的相關研究，使我們在認識國際社會民主進程時，具備更完備的視角。

---

50 The World Bank. 2020. "Doing Business: Measuring Business Regulations." <https://www.doingbusiness.org/en/doingbusiness> (Accessed on May 07, 2021)。

## 中文參考文獻

邱稔壤，2012，〈聯合國在拉丁美洲之維和行動與人道救援：以中共在加勒比海之實踐為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聯合國與國際衝突解決」整合型計畫，計畫編號：NSC 96-2414-H-004-039-MY3，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 英文參考文獻

- Adhikari, Monalisa. 2020. "Breaking the Balance? The Impact of Peacekeeping Deployments o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27(3): 369–94.
- African Union Peace and Security Council. 2019. "The African Standby Force (ASF)." <https://www.peaceau.org/en/page/82-african-standby-force-asf-amani-africa-1> (Accessed on April 13, 2021).
- Albrecht, Holger. 2020. "Diversionary Peace: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and Domestic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1–31.
- Andersson, Andreas. 2000. "Democracies and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1990–1996."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7(2): 1–22.
- Andrea Ruggeri, Theodora-Ismene Gizelis, and Han Dorussen. 2013. "Managing Mistrust: An Analysis of Cooperation with UN Peacekeeping in Afric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7(3): 387–409.
- Andres Martinez Casares. 2019. "U.N. peacekeeping mission to Haiti ends after 15 years with mixed legacy."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aiti-politics-idUSKBN1WU2SP> (Accessed on April 09, 2021).
- Anthony, Wanis-St. John. 1997. "Third Party Mediation over Kashmir: A Modest Proposal."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4(4): 1–30.
- Arı, Barış, and Theodora-Ismene Gizelis. 2020. "Civil Conflict Fragmentat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1–28.
- Bara, Corinne, and Lisa Hultman. 2020. "Just Different Hats? Comparing UN and Non-UN Peacekeeping."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27(3): 341–68.
- Beardsley, Kyle, and Holger Schmidt. 2012. "Following the Flag or Following the Charter? Examining the Determinants of UN Involvement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 1945-20021: Following the Flag or Following the Chart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6(1): 33–49.
- Beardsley, Kyle, and Nigel Lo. 2014. "Third-Party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the Willingness to Make Concess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8(2): 363–92.
- Beardsley, Kyle. 2013. "The UN at the Peacemaking-Peacebuilding Nexu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30(4): 369-386.
- Bellemare, Marc F., Takaaki Masaki and Thomas Pepinsky. 2017. "Lagged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the Estimation of Causal Effec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9(3):949-963.
-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James D. Morrow,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Alastair Smith. 1999. "An Institutional Explan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3(4): 791–807.
- Buergenthal, Thomas. 1997. "The Normative and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Human Rights Quarterly*, 19(4): 703-723.
- Buergenthal, Thomas. 2006. "The Evolving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yste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00(4): 783-807.
- Carnegie, Allison, and Christoph Mikulaschek. 2020. "The Promise of Peacekeeping: Protecting Civilians in Civil Wa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23.
- Carnegie, Allison, and Nikolay Marinov. 2017. "Foreign Aid,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Promotion: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1(3): 671–83.
- Carnegie, Allison. 2015. *Power Plays: How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Reshape Coercive Diplomac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en, Chong, and Kyle Beardsley. 2020. "Once and Future Peacemakers: Continuity of Third-Party Involvement in Civil War Peace Processes."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1–27.
- Chris Perry, and Adam Smith. 2018. "Providing for peacekeeping." <https://www.ipinst.org/providing-for-peacekeeping-database/ppp-dataset> (Accessed on April 6, 2021).
- Coan, Travis, and Mirya Holman. 2008. "Voting Green."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9(5): 1121–1135.
- Collier, Paul, Ibrahim Elbadawi, and Nicholas Sambanis. 2000. "Why Are There so Many Civil Wars in Africa? Prevention of Future Conflicts and Promotion of

- Inter-Group Cooperation.” The World Bank.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279191468768305499/Why-are-there-so-many-civil-wars-in-Africa-prevention-of-future-conflicts-and-promotion-of-inter-group-cooperation>(Accessed on June 11, 2020).
- Costello, Patrick. 1995. “Haiti: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3ae6a6c30.html> (Accessed on April 23, 2021).
- Cunliffe, Philip. 2018. “From Peacekeepers to Praetorians – How Participating i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May Subvert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2(2): 218–39.
- Cunningham, David,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and Idean Salehyan. 2013. “Non-State Actors in Civil Wars: A New Dataset.”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30(5): 516–31.
- Cunningham, David. 2006. “Veto Players and Civil War Du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0(4): 875–92.
- Cunningham, Kathleen Gallagher, Marianne Dahl, and Anne Frugé. 2020. “Introducing the Strategies of Resistance Data Proje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7(3): 482–91.
- Diamond, Larry, and Leonardo Morlino. 2004.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An Overview.” *Journal of Democracy* 15 (4): 20–31.
- Diehl, Paul. 2016. “Breaking the Conflict Trap: The Impact of Peacekeeping on Violence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Post-Conflict Context.” in David Mason and Sara McLaughlin Mitchell T., eds., *What Do We Know about Civil Wars?*, pp. 139-156. New York, USA: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ress.
- Doyle Michael, and Nicholas Sambanis. 2000. “International Peacebuilding: A Theoretic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 (4): 779-801.
- Doyle Michael, and Nicholas Sambanis. 2006. *Making war building peace*. New Jersey, US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oyle, Michael. 2005. “Three Pillars of the Liberal Pea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3): 463–66.
- Durch, William. 1993. *The Evolution of UN Peacekeeping: Case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 USA: St. Martin’s Press.



- Duursma, Allard. 2017. "Partnering to Make Peace: The Effectiveness of Joint African and Non-African Mediation Efforts."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24(4): 590–615.
- Fearon James, and David Laitin. 2003.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01): 75–90.
- Fearon, James. 1994.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3): 577–92.
- Fetherston A.B. 1994. "Case Studies: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in Cyprus, Namibia and Former Yugoslavia." in *Towards a Theory of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 Fjelde Hanne, and Höglund Kristine. 2011. *Building Peace, Creating Conflict? : Conflictual Dimensions of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Peacebuilding*. Lund, Sweden: Nordic Academic Press.
- Fortna, Virginia Page. 2003. "Scraps of Paper? Agreements and the Durability of Pea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7(2): 337–72.
- Fortna, Virginia Page. 2004. "Does Peacekeeping Keep Peace?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and the Duration of Peace After Civil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8(2): 269–92.
- Fortna, Virginia Page. 2008. "Peacekeeping and democratization." in Anna K. Jarstad and Timothy D. Sisk, eds., *From War to Peace: Dilemmas of Peacebuilding*, pp. 39-79.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eedom House. 2021. "Period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1999–2000, Pro-democracy civic movement: not present." [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inline\\_images/Croatia.pdf](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inline_images/Croatia.pdf) (Accessed on April 15, 2021).
- Gelpi, Christopher. 1997. "Democratic Diversions: Governmental Structure and the Externalization of Domestic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1(2): 255–82.
- Håvard Hegre, Tanja Ellingsen, Scott Gates, and Nils Petter Gleditsch. 2001. "Toward a Democratic Civil Peace? Democracy, Political Change, and Civil War, 1816-1992."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5(1), 33-48.

- Heldt, Birger, and Peter Wallensteen. 2005.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Global Patterns of Intervention and Success, 1948-2004*. Stockholm, Sweden: Folke Bernadotte Academy Publications.
- Heldt, Birger. 2005. "Ca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romote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7(2): 304–7.
- Hippel, Karin von. 1995. "Democratization as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Haiti." *The World Today*, 51(1), 11-14.
- Höglund, Kristine. 2011. "Obstacles to Monitoring: Perceptions of the Sri Lanka Monitoring Mission and the Dual Role of Norway."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18(2): 210–25.
- Holt, Victoria, Glyn Taylor, and Max Kelly. 2009. "Protecting Civilians in the Context of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United Nations. " <https://www.unocha.org/sites/dms/Documents/Protecting%20Civilians%20in%20the%20Context%20of%20UN%20Peacekeeping%20Operations.pdf>(Accessed on December 02, 2020).
- Howard, Lise Morjé, and Anjali Kaushlesh Dayal. 2018. "The Use of Force in UN Peacekeep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2(1): 71–103.
- Hultman Lisa, Jacob Kathman, and Megan Shannon. 2013.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and civilian protection in civil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7 (4): 875–91.
- Hunnicut Patrick, and William Nomikos. 2019. "Non-Combatants or Counter-Insurgents?" <https://www.williamgnomikos.com/research.html>. (Accessed on June 11, 2020).
- Hunnicut Patrick, and William Nomikos. 2020. "Nationality, Gender, and Deployments at the Local Level: Introducing the RADPKO Dataset."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0(0): 1–28.
- Hunt, Charles. 2017. "All Necessary Means to What Ends?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the 'Robust Turn' in UN Peace Operations."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24(1): 108–31.
- Huntington, Samuel.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1. paperback print. Norman, US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Ivan Koprić, Romea Manojlović and Petra Đurman. 2016. "Local democracy development in Croatia: from experimental self-management to weak local democrac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0th ECPR General Conference. Prag, Češk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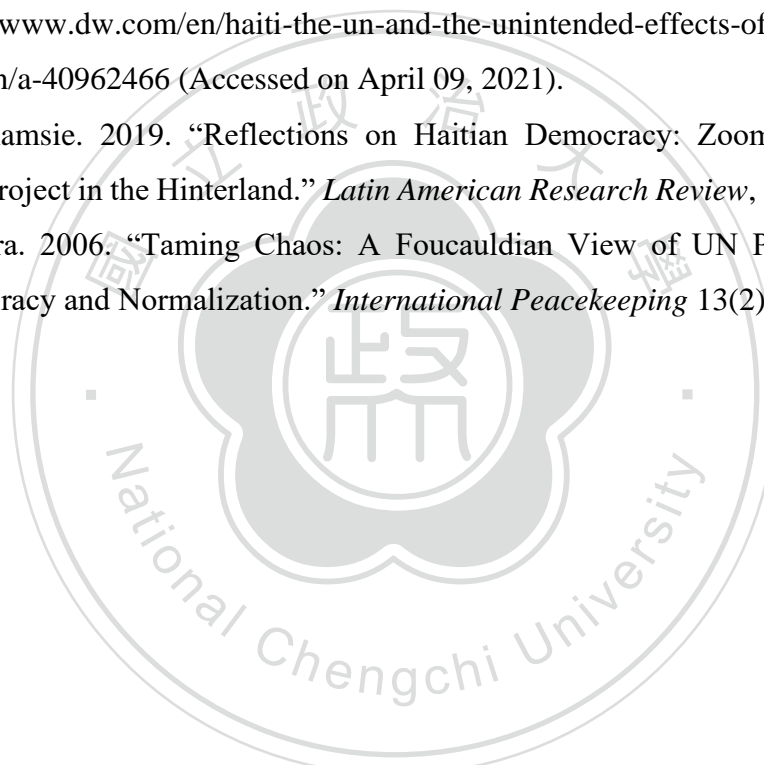
- Jarstad, Anna. 2008. "Dilemmas of War-to Democracy Transition: Theories and Concepts." in Anna Jarstad and Timothy Sisk, eds., *From War to Democracy: Dilemmas of Peacebuilding*, pp. 17-36.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arstad, Anna. 2016. "Democratization After Civil War." In Brown Langer and Graham Arnim, eds., *Building Sustainable Peace: Timing and Sequencing of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and Peacebuilding*, pp. 87-109.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thman, Jacob. 2013.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Personnel Commitments, 1990–2011."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30(5): 532-49.
- King, Gary. 1997. *A Solution to the Ecological Inference Problem: Reconstructing Individual Behavior from Aggregate Data*. Princeton, US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indley, Dan. 2007. *Promoting Peace with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as a Tool of Security Regimes*. Princeton, US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oz Zeev, and Russett Bruce. 1993. "Normative and Structural Causes of Democratic Peace, 1946–1986."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3): 624–38.
- Marten, Kimberly Zisk. 2004. *Enforcing the Peace, Learning from the Imperial Past*: New York, US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attes Michaela, and Savun Burcu. 2010. "Information, Agreement Design, and the Durability of Civil War Settlem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4(2): 511–24.
- Mearsheimer, John. 2019.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3(4): 7–50.
- Mikulaschek, Christoph. 2019. "The Power of the Weak: How Informal Power-Sharing Shapes the Work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Ph. 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Accessed on December 28, 2020).
- Mironova Vera, and Whitt Sam. 2017.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and Positive Peace: Evidence from Kosovo."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1(10): 2074–2104.
- Montgomery, Tommie Sue. 2000. *Peacemaking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Florida, USA: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 Monty Marshall, and Gabrielle Elzinga-Marshall. 2018. "State Fragility Index and Matrix, Time-Series Data, 1995-2018." <https://www.systemicpeace.org/inscrdata.html> (Accessed on April 15, 2021).

- Mosquera, Andres Munoz. 2011. *Democratization through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 Peacekeeping Regimes*. Oisterwijk, Netherlands: Wolf Legal Publishers Press.
- 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2021. "Overview of Croatia." <https://www.ndi.org/central-and-eastern-europe/croatia> (Accessed on April 15, 2021).
-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se. 2018. "Canadian Armed Forces: Wars and operations." <https://www.canada.ca/en/department-national-defence/services/military-history/history-heritage/past-operations/europe/harmony.html> (Accessed on April 13, 2021).
- Neack, Laura. 1995. "UN Peace-Keeping: In the Interest of Community or Self?"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2(2): 181–96.
- Nye, Joseph. 2019.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Hegemony from Wilson to Trump." *International Affairs* 95(1): 63–80.
- Owens, Mackubin Thomas. 2012. "What Military Officers Need to Know about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65(2): 67-87.
- Pevehouse, Jon. 2005. *Democracy from Above: Regional Organiza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1st e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ickering Jeffrey, and Kisangani Emizet. 2005. "Democracy and Diversionary Military Intervention: Reassessing Regime Type and the Diversionary Hypothe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9(1): 23–44.
- Press, Daniel. 2003. "Who Votes for Natural Resources in California?"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16(9): 835–46.
- Pushkina, Darya. 2004. "Towards Successful Peace-keeping: Remembering Croatia."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39(4), 393-415.
- Report of the Panel on UN Peace Operations, UN Security Council Document. , 2000.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whole question of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 all their aspects." <https://www.un.org/ruleoflaw/files/brahimi%20report%20peacekeeping.pdf> (Accessed on April 6, 2021).
- Robert, Fatton. 2004. "Citizenship and Democratization in Haiti." in Ramazani, Rouhollah, and Robert Fatton, eds., *The Future of Liberal Democracy: Thomas*

- Jefferson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 New York, USA: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 Rost Nicolas, and Greig Michael. 2011. “Taking Matters into Their Own Hands: An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State-Conducted Peacekeeping in Civil War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8(2): 171–84.
- Sayrs, Lois. 1989. *Pooled Time Series Analysis*. California, USA: Sage Publications Press.
- Seawright Jason, and Gerring John. 2008. “Case Selection Techniques in Case Study Research: A Menu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Option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61(2): 294–308.
- Smith, Alastair. 1996. “Diversionary Foreign Policy in Democratic Syste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0(1): 133–53.
- Sotomayor, Arturo. 2002. “Review of Peacemaking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55(2): 531–38.
- Stojek Szymon, and Tir Jaroslav. 2015. “The Supply Side of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Trade Ties and United Nations-Led Deployments to Civil War Stat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1(2): 352–76.
- Strand Håvard, Siri Aas Rustad, Henrik Urdal and Håvard Mogleiv Nygård. 2019. “Trends in Armed Conflict, 1946–2018.” <https://www.prio.org/Publications/Publication/?x=11349> (Accessed on December 30, 2020).
- Tardy, Thierry. 2011. “A Critique of Robust Peacekeeping in Contemporary Peace Operations.”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18(2): 152–67.
- Tardy, Thierry. 2015. “United Nations Protection Force (UNPROFOR—Croatia).” in Joachim Koops, Thierry Tardy, Norrie MacQueen, and Paul William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rouillot, Michel-Rolph. 1994. “Haiti’s Nightmare and the Lessons of History.” *NACLA Report on the Americas* 27(4): 46–51.
-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Peace Operations Official Website: <https://peacekeeping.un.org/zh> (Accessed on December 02, 2020).
-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https://peacekeeping.un.org/sites/default/files/capstone\\_eng\\_0.pdf](https://peacekeeping.un.org/sites/default/files/capstone_eng_0.pdf) (Accessed on December 02, 2020).



- Vargas Cullell, Jorge. 2012.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O'Donnell's Critique of Procedural Democracy."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52068551\\_Democracy\\_and\\_democratization\\_O%27Donnell%27s\\_Critique\\_of\\_procedural\\_democracy](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52068551_Democracy_and_democratization_O%27Donnell%27s_Critique_of_procedural_democracy) (Accessed on April 13, 2021).
- Wall James, and Druckman Daniel. 2003. "Mediation in Peacekeeping Miss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7(5): 693–705.
- Walter, Barbara. 2015. "Why Bad Governance Leads to Repeat Civil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9(7): 1242–72.
- Walter, Jan. 2017. "Haiti, the UN and the unintended effects of a peace mission." <https://www.dw.com/en/haiti-the-un-and-the-unintended-effects-of-a-peace-mission/a-40962466> (Accessed on April 09, 2021).
- Yasmine, Shamsie. 2019. "Reflections on Haitian Democracy: Zooming in on a Megaproject in the Hinterland."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54(1), 35–49.
- Zanotti, Laura. 2006. "Taming Chaos: A Foucauldian View of UN Peacekeeping, Democracy and Normalization."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13(2): 150–67.



## 附錄一 執行中的維持和平行動<sup>51</sup>

編號	設立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簡稱	地區
1.	1948	聯合國停戰監督組織	United Nations Truce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	UNTSO	以色列-巴勒斯坦
2.	1949	聯合國印度和巴基斯坦軍事觀察組織	United Nations Military Observer Group in India and Pakistan	UNMOGIP	印度-巴基斯
3.	1964	聯合國駐賽普勒斯維持和平部隊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Force in Cyprus	UNFICYP	賽普勒斯
4.	1974	聯合國監督停火與脫離接觸觀察員部隊	United Nations Disengagement Observer Force	UNDOF	以色列-敘利亞(戈蘭高地 Golan)
5.	1978	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	United Nations Interim Force In Lebanon	UNIFIL	黎巴嫩
6.	1991	聯合國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mission for the referendum in western Sahara	MINURSO	西撒哈拉
7.	1999	聯合國科索沃臨時行政當局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Kosovo	UNMIK	科索沃
8.	2010	聯合國剛果民主共和國穩定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 stabilization mission in the D.R. of the Congo	MONUSCO	剛果民主共和國
9.	2011	聯合國阿卜耶伊臨時安全部隊	United Nations Interim Security Force for Abyei	UNISFA	北非蘇丹(Abyei)
10.	2013	聯合國馬利多層面綜合穩定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ed stabilization mission in Mali	MINUSMA	馬利
11.	2014	聯合國中非共和國多層面綜合穩定團	United nations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ed stabilization mission in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MINUSCA	中非共和國
12.	2011	聯合國南蘇丹共和國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South Sudan	UNMISS	南蘇丹

資料來源：UNDPO(2021)。

51 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聯合國財政年度預算分配給維持和平行動的核定金額約為65億美元。該筆預算將用於除停戰監督組織(United Nations Truce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 以下簡稱UNTSO)及印巴觀察組織(United Nations Military Observer Group in India and Pakistan, 以下簡稱UNMOGIP)外的其餘十項任務, UNTSO與UNMOGIP任務執行經費由聯合國經常預算提供(UNDPO, 2020)。

## 附錄二 執行完畢的維持和平行動

編號	設立	終止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簡稱	地區
1.	1956	1967	聯合國緊急部隊 I	United Nations Emergency Force I	UNEF I	中東(加薩走廊)
2.	1958	1958	聯合國黎巴嫩觀察團	United Nations Observation Group in Lebanon	UNOGIL	黎巴嫩
3.	1960	1964	聯合國剛果行動	United Nations Operation in the Congo	ONUC	剛果
4.	1962	1963	聯合國西新幾內亞安全部隊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Force in West New Guinea	UNSF	西新幾內亞
5.	1963	1964	聯合國葉門觀察團	United Nations Yemen Observation Mission	UNYOM	葉門
6.	1965	1966	秘書長特別代表駐多明尼加共和國特派團	Mission of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 - General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	DOMREP	多明尼加
7.	1965	1966	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觀察團	United Nations India - Pakistan Observation Mission	UNIPOM	印度-巴基斯坦
8.	1973	1979	聯合國緊急部隊 II	United Nations Emergency Force II	UNEF II	中東-蘇伊士運河
9.	1988	1990	聯合國阿富汗-巴基斯坦斡旋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Good Offices Mission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UNGOMAP	阿富汗-巴基斯坦
10.	1988	1991	聯合國伊朗-伊拉克軍事觀察團	United Nations Iran - Iraq Military Observer Group	UNIIMOG	伊朗-伊拉克
11.	1989	1991	聯合國安哥拉核查團 I	United Nations Angola Verification Mission I	UNAVEM I	安哥拉
12.	1989	1990	聯合國過渡時期援助團	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 Assistance Group	UNTAG	納米比亞
13.	1989	1992	聯合國中美洲觀察團	United Nations Observer Group in Central America	ONUCA	中美洲
14.	1991	1995	聯合國安哥拉核查團 II	United Nations Angola Verification Mission II	UNAVEM II	安哥拉
15.	1991	2003	聯合國伊拉克-科威特觀察團	United Nations Iraq - Kuwait Observation Mission	UNIKOM	伊拉克-科威特
16.	1991	1995	聯合國薩爾瓦多觀察團	United Nations Observer Mission in El Salvador	ONUSAL	薩爾瓦多
17.	1991	1992	聯合國駐柬埔寨先遣團	United Nations Advance Mission in Cambodia	UNAMIC	柬埔寨
18.	1992	1993	柬埔寨過渡時期聯合國權力機構	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al Authority in Cambodia	UNTAC	柬埔寨
19.	1992	1995	聯合國保護部隊	United Nations Protection Force	UNPROFOR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
20.	1992	1993	聯合國索馬利亞行動 I	United Nations Operation in Somalia I	UNOSOM I	索馬利亞

21.	1992	1994	聯合國莫三比克行動	United Nations Operation in Mozambique	ONUMOZ	莫三比克
22.	1993	1995	聯合國索馬利亞行動 II	United Nations Operation in Somalia II	UNOSOM II	索馬利亞
23.	1993	1994	聯合國烏干達-盧安達觀察團	United Nations Observer Mission Uganda - Rwanda	UNOMUR	烏干達-盧安達
24.	1993	1997	聯合國賴比瑞亞觀察團	United Nations Observer Mission in Liberia	UNOMIL	賴比瑞亞
25.	1993	1996	聯合國海地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Haiti	UNMIH	海地
26.	1993	1996	聯合國盧安達援助團	United Nations Assistance Mission for Rwanda	UNAMIR	盧安達
27.	1994	1994	聯合國奧索狹帶觀察團	United Nations Aouzou Strip Observer Group	UNASOG	利比亞-查德
28.	1994	2000	聯合國塔吉克觀察團	United Nations Mission of Observers in Tajikistan	UNMOT	塔吉克
29.	1995	1997	聯合國安哥拉核查團 III	United Nations Angola Verification Mission III	UNAVEM III	安哥拉
30.	1995	1996	聯合國克羅埃西亞恢復信任行動	United Nations Confidence Restoration Operation in Croatia	UNCRO	克羅埃西亞
31.	1995	1999	聯合國預防性部署部隊	United Nations Preventive Deployment Force	UNPREDEP	馬其頓
32.	1995	2002	聯合國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Bosnia and Herzegovina	UNMIBH	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
33.	1996	2002	聯合國普雷夫拉卡觀察團	United Nations Mission of Observers in Prevlaka	UNMOP	克羅埃西亞
34.	1996	1998	聯合國東斯洛伐尼亞過渡行政當局	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al Administration for Eastern Slavonia, Baranja and Western Sirmium	UNTAES	東斯洛伐尼亞、巴拉尼亞和西塞爾曼地區
35.	1996	1997	聯合國海地支助團	United Nations Support Mission in Haiti	UNSMIH	海地
36.	1997	1997	聯合國瓜地馬拉核查團	United Nations Verification Mission in Guatemala	MINUGUA	瓜地馬拉
37.	1997	1999	聯合國安哥拉觀察團	United Nations Observer Mission in Angola	MONUA	安哥拉
38.	1997	1997	聯合國海地過渡時期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 Mission in Haiti	UNTMIH	海地
39.	1997	2000	聯合國海地民警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Civilian Police Mission in Haiti	MIPONUH	海地
40.	1998	1998	聯合國警察支助小組	United Nations Civilian Police Support Group	UNCPSG	克羅埃西亞境內
41.	1998	2000	聯合國中非共和國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MINURCA	中非共和國
42.	1998	1999	聯合國獅子山觀察團	United Nations Observer Mission in Sierra Leone	UNOMSIL	獅子山
43.	1999	2005	聯合國獅子山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Sierra Leone	UNAMSIL	獅子山

44.	1999	2002	聯合國東帝汶過度行政當局	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al Administration in East Timor	UNTAET	東帝汶
45.	1999	2010	聯合國剛果民主共和國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 Mission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MONUC	剛果民主共和國
46.	2000	2008	聯合國衣索匹亞-厄利垂亞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Ethiopia and Eritrea	UNMEE	衣索匹亞-厄利垂亞
47.	2002	2005	聯合國東帝汶支助團	United Nations Mission of Support in East Timor	UNMISSET	東帝汶
48.	2003	2018	聯合國賴比瑞亞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Liberia	UNMIL	賴比瑞亞
49.	2003	2004	聯合國象牙海岸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Côte d'Ivoire	MINUCI	象牙海岸
50.	2004	2017	聯合國象牙海岸行動	United Nations Operations in Côte d'Ivoire	UNOCI	象牙海岸
51.	2004	2017	聯合國海地穩定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Stabilization Mission in Haiti	MINUSTAH	海地
52.	2004	2006	聯合國蒲隆地行動	United Nations Operation in Burundi	ONUB	蒲隆地
53.	2005	2011	聯合國蘇丹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the Sudan	UNMIS	蘇丹
54.	2006	2012	聯合國東帝汶綜合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Integrated Mission in Timor - Leste	UNMIT	東帝汶
55.	2007	2020	非洲聯盟-聯合國達佛綜合行動	African Union - United Nations Hybrid Operation in Darfur	UNAMID	達佛
56.	2007	2010	聯合國中非共和國-查德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and Chad	MINURCAT	中非共和國-查德
57.	2012	2012	聯合國敘利亞監督團	United Nations Supervision Mission in Syria	UNSMIS	敘利亞
58.	2017	2019	聯合國海地司法支助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Mission for Justice Support in Haiti	MINUJUSTH	海地

資料來源：UNDPO(2021)。



### 附錄三 投票支持維和任務(本文研究個案)的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

年份	非常任理事國	維持和平行動
	維德角(Cape Verde) 匈牙利(Hungary) 日本(Japan) 摩洛哥(Morocco)	
1993	委內瑞拉(Venezuela) 阿根廷(Argentina) 捷克(Czech Republic) 奈及利亞(Nigeria) 葉門(Oman) 盧安達(Rwanda) 阿根廷(Argentina) 捷克(Czech Republic) 奈及利亞(Nigeria) 葉門(Oman)	聯合國海地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Haiti)
1995	盧安達(Rwanda) 智利(Chile) 埃及(Egypt) 幾內亞比索(Guinea-Bissau) 南韓(Republic of Korea) 波蘭(Poland) 波扎那(Botswana) 德國(Germany) 宏都拉斯(Honduras) 印尼(Indonesia)	聯合國克羅埃西亞恢復信任行動 (United Nations Confidence Restoration Operation)
1996	義大利(Italy) 肯亞(Kenya) 日本(Japan) 哥斯大黎加(Costa Rica) 葡萄牙(Portugal) 瑞典(Sweden) 智利(Chile) 埃及(Egypt) 幾內亞比索(Guinea-Bissau) 南韓(Republic of Korea)	聯合國海地支助團 (United Nations Support Mission in Haiti) 聯合國普雷夫拉卡觀察團 (United Nations Mission of Observers in Prevlaka)
1997	波蘭(Poland) 加彭(Gabon) 甘比亞(Gambia) 巴林(Bahrain) 巴西(Brazil) 斯洛維尼亞(Slovenia)	聯合國海地過渡時期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 Mission in Haiti) 聯合國海地民警特派團 (United Nations Civilian Police Mission in Haiti)

資料來源：UN(2021)、UNDPO(2021)。

說明：由於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美國、英國、法國、俄國、中國皆一致同意授權執行上述六項維持和平行動，故於表中省略。